“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语言词条选译（一）*

“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全书》翻译工程”

项目组 译

按 语：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为了使读者了解有关国家主体民族的语言，我们特整理编辑本课题组已译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全书》中的相关词条，作为课题阶段性成果，从本期起分3期陆续刊登，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世界诸语言（Языки мира）

[原作者：Вяч. Вс. 伊万诺夫（Вяч. Вс. Иванов），译者：刘永红，华中师范大学]

指居住在（和曾经居住在）地球上的各个民族的语言，总数在2500到5000种之间（准确数字无法确定，因为不同语言之间以及同一种语言的方言之间的区别是带约定性的）。世界上最通行的语言（将说该语言的人以及在族际和国际交往中以该语言作为第二语言的人都计算在内）有：汉语（10亿以上；1985年数据，下同）、英语（4.2亿）、印地语及与其相近的乌尔都语（3.2亿）、西班牙语（3亿）、俄语（2.5亿）、印度尼西亚语（1.7亿）、阿拉伯语（1.7亿）、孟加拉语（1.7亿）、葡萄牙语（1.5亿）、日语（1.2亿）、德语（1亿）、法语（1亿）、旁遮普语（0.82亿）、意大利语（0.7亿）、朝鲜语（0.65亿）、泰卢固语（0.63亿）、马拉提语（0.57亿）、泰米尔语（0.52亿）和乌克兰语（0.45亿）等。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根据它们的亲属联系可以区分为语系，其中每个语系都源自一组彼此相近的方言，这些方言在古代同属一种语言或者同一语言联盟（一组地域上邻近并拥有一系列共同特征的语言）；参见语言的谱系分类。

研究得最深入的语系是印欧语系（参见**印欧语系**）。印欧语系源于一组近亲方言，使用这些方言的人口在公元前第三千年就开始从西亚向黑海北岸的南部和里海沿岸地区扩展。根据公元前第二千年的古文字遗存辨识出后来消亡的小亚细亚印欧语言——楔形文字赫梯语，它与晚近时期（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吕底亚语相近，另外还发现了其他的安纳托利亚语——帕莱语和楔形文字卢维语，其中楔形文字卢维语延续至公元前第一千年，成为象形文字卢维语和（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吕西亚语。借助自公元前第二千年的文本遗存还辨识出古希腊语的一种方言，以线性文字B书写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本使用的就是这种方言。在公元前第

*本栏目刊登的选译词条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语言学大百科全书》翻译工程”（11&ZD131）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由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承担，项目首席专家张家骅，译者和审校者均为项目组成员。“‘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语言词条选译（一）”的审校者为许高渝、张家骅。

二千年，与希腊语相近的雅利安（印度—伊朗）印欧诸方言的使用者已经居住在近东，西亚古文字遗存中的美索不达米亚雅利安语的词汇和姓名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努里斯坦（阿富汗的一个省）使用的现代努里斯坦（卡菲尔）诸语言起源于古老的雅利安各部落的方言，它们在雅利安诸语言的两个基本语支（印度语支与伊朗语支）之间处在过渡的位置。

古印度语的早期文本写成于公元前第二千年末至公元前第一千年初。从古印度语（其标准形式为梵语，一直到现代仍在印度使用）衍生出了中古印度诸语言，即普拉克里特诸语言，而从这些中古印度诸语言又发展出了现代印度诸语言：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马拉提语、旁遮普语、拉贾斯坦语、古吉拉特语、奥里亚语（或称奥德里语、乌特卡利语）及其他语言。与古印度语极相近的有公元前第一千年的古伊朗诸语言——古波斯语、只有一小部分词为人所知的米提亚语和阿维斯陀语（写作《阿维斯塔》的语言），以及后来的北部黑海沿岸的西徐亚诸方言和萨尔马提亚诸方言。与后者在历史上相关联的有东部地区的中古伊朗诸语言——粟特语（曾为中亚各民族的交往语言）、和田塞克语、巴克特里亚语和花刺子模语，这些中古伊朗诸语言因其千余年的文献记载而知名。中古波斯诸语言（或称巴列维语）和帕提亚语同属于西部中古伊朗诸语言。属于现代伊朗诸语言的有：西部诸语言——波斯语或称法尔西语、塔吉克语、库尔德语、俾路支语、塔特语、塔雷什语及其他语言；东部诸语言——达里语、普什图语或称阿富汗语、奥塞梯语（历史上与伊朗东部的西徐亚语相关联）、帕米尔诸语言（其中包括瓦罕语、舒格南语及其他语言）、雅格诺布语（是粟特语的延续）。

自公元前第一千年起的一些古文献获得破解，它们使用的是若干西部印欧语言，其中包括意大利克诸语言；意大利克诸语言这个概括术语将人们凭借数量有限的文献遗存揭示的奥斯克—翁布里亚诸语言和拉丁语结合在一起，后者与法利斯克语属于拉丁—法利斯克语族（维涅特语也与该语族相近）。拉丁语仍作为天主教教会语言保存至今。罗马帝国分裂后，拉丁语的某些方言发展成为罗曼诸语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与其相近的加利西亚语、卡塔兰语、法语、奥克西坦语或称普罗旺斯语、雷托罗曼语、意大利语、撒丁语、19 世纪末消亡的达尔马提亚语和罗马尼亚语，还有其他一些与罗马尼亚语相近的巴尔干罗曼诸语言及其方言。

与意大利克诸语言相近的是凯尔特诸语言，其中包括高卢次语族（消亡的高卢语），盖德尔次语族，后者囊括爱尔兰语（有自中世纪早期起的古文献）、苏格兰语、马恩语（马恩岛上），以及不列颠次语族，包括布列塔尼语（借助自 8 世纪的古文献疑难注释和 14 世纪的文学文本而知晓）、威尔士语（或称威尔斯语）和消亡了的康沃尔语。西班牙还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用伊比利亚凯尔特语（凯尔特伊比利亚语）书写的古老铭文。在古代印欧诸语言的西部诸语族中，除意大利克诸语言与凯尔特诸语言外，还包括属伊利里亚语族的诸消亡语言（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伊利里亚语和梅萨普语），以及日耳曼诸语言，其中，日耳曼诸语言分为三个次语族：东日耳曼次语族——消亡了的哥特语；北日耳曼次语族或斯堪的纳维亚次语族——瑞士语、丹麦语、挪威语、冰岛语；西日耳曼次语族——英语及类似英语的弗里西亚语、弗拉芒语、荷兰语、阿非利堪斯语（布尔语）、德语和依地语。处于西部印欧诸语言（凯尔特诸语言、意大利克诸语言、日耳曼诸语言、伊利里亚诸语言）和东部印欧诸语言（雅利安—希腊—亚美尼亚语族，包括雅利安诸语言、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后者依据自公元 5 世纪用格拉巴尔文字书写的古老文本而知晓）之间的是波罗的一斯拉夫诸语言。波罗的一斯拉夫诸语言分为两大类：与西部印欧诸语言极为相近的，包括西部波罗的诸语言（消亡的普鲁士语和其他仅知道个别单词的一些方言）、东部波罗的诸语言（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的波罗的诸语言和斯拉夫诸语言，后者包括东斯拉夫诸语言（俄语、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西斯拉夫诸语言（捷克语、斯洛伐克语、波兰语、卢日支语、已消亡了的拉贝河沿岸语）和南斯拉夫诸语言——古斯拉夫语（以其为基础形成教堂斯拉夫语的数种不同变体，或称抄本，它们作为教堂用语保留至今）、马其顿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斯洛文尼

亚语。曾经处于东部语言和西部语言中间位置的古印欧语还包括消亡的吐火罗诸语言（在中亚地区发现的公元5—8世纪的古文献），凭借一些资料判断，它们与安纳托利亚诸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许多消亡的印欧语都仅仅借助少得可怜的资料为人所知，如凭借在小亚细亚（弗里吉亚人约于公元前12世纪从巴尔干半岛迁居至此）发现的碑铭被人所知的弗里吉亚语；如同伊利里亚语一样，与现代阿尔巴尼亚语有联系的巴尔干半岛上的色雷斯语；与希腊语相近的古马其顿语；和印欧前希腊语（或称佩拉斯吉语）相近的腓利斯丁语；与凯尔特语相近的北意大利勒蓬蒂碑铭语；利古里亚语等等。

属亚非超语系（阿非罗—亚细亚超语系或称闪米特—含米特超语系）（参见**亚非诸语言**）的有闪米特诸语言、古埃及语（及其延续科普特语）、柏柏尔—利比亚诸语言、库施特诸语言[索马里语、奥罗莫语（加拉语）和其他语言；部分库施特语有时被单列为亚非诸语言的一个专门的奥莫特次语族]，乍得诸语言（其中使用最广泛的是豪萨语）。闪米特语族由五个语支构成，这五个语支似可合并为东西两个基本语支，进而再将它们划分为南、北两个次语支。东部（或称东北部，北部边缘）闪米特诸语言中有消亡的阿卡德语，亦即亚述—巴比伦语，或称巴比伦—亚述语。西部闪米特诸语言中的北方语支（或中北部语支）包括迦南诸语言和阿拉米诸语言（诸方言）。迦南次语支又包括已消亡的埃勃拉语或称古迦南语（最古老的文献于1974—1979年在叙利亚北部古老的埃勃拉城中被发现，这些文献属于公元前第三千年的下半叶，与阿卡德语十分相似）、腓尼基语[腓尼基—布匿语；腓尼基国、地中海地区腓尼基人居民点（其中包括当时使用腓尼基—布匿语的迦太基城邦）的语言]和摩押语、古犹太语及其现代形式伊夫里特语。与迦南次语支密切相关的还有拉斯沙姆拉（古乌加里特）城出土的公元前14—15世纪文本的乌加里特语，但该语言如同部分的埃勃拉语一样，处在东西闪米特诸语言的中间地位。属阿拉米次语支的有阿拉米语，该语言在公元之初曾是近东地区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但后来几乎完全被阿拉伯语所取代；东部阿拉米诸方言与亚述语（艾索尔语）历史上相关联。西南闪米特诸语言可分为三个次语支：中南次语支（阿拉伯语）、南阿拉伯次语支和与其相近的埃塞俄比亚闪米特次语支（埃塞俄比亚闪米特诸语言中使用最广泛的是阿姆哈拉语）。

属卡特维尔语族，即南部高加索语族（参见**卡特维尔诸语言**）的语言有：格鲁吉亚语、梅格列尔语[与拉兹语（恰内语）一起构成赞次语族]、斯万语。有推测认为，卡特维尔诸语言与北高加索诸语言是亲属语言，并且一起组成高加索（伊比利亚—高加索）语系，但这一假设没有得到证实；高加索语系所根据的那些共同词汇和形式中的大部分情况都可以由它们随后归入的同一个高加索语言联盟加以解释。

高加索（伊比利亚—高加索）诸语言有时被与巴斯克语（在西班牙和法国南部）合并为巴斯克—高加索语系，但巴斯克语与高加索诸语言的亲属关系尚未得到证实。

芬兰—乌戈尔诸语言（或称乌戈尔—芬兰诸语言）分为两个基本次语族：芬兰次语族和乌戈尔次语族。属于乌戈尔次语族的有西西伯利亚的鄂毕—乌戈尔诸语言——汉蒂语（奥斯恰茨语）、曼西语（沃古尔语）以及匈牙利语，操匈牙利语者因为早在公元第一千年远迁西方，以致与鄂毕—乌戈尔诸语言使用者的空间距离已相隔十分遥远。芬兰次语族包括彼尔姆诸语言——科米—彼尔姆语、科米—齐梁语和乌德穆尔特语（沃加克语）以及波罗的海沿岸—芬兰—伏尔加诸语言。伏尔加诸语言，即摩尔多瓦诸语言（埃尔齐亚—摩尔多瓦语和莫克沙—摩尔多瓦语）、马里诸语言（草地马里语和山地马里语）、萨阿米语（苏联摩尔曼斯克州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两种方言）和波罗的海沿岸—波兰—芬兰诸语言（芬兰语、爱沙尼亚语和一些使用地域不广的语言）合在一起均可纳入波罗的海沿岸—芬兰—伏尔加诸语言。

芬兰—乌戈尔语系和苏联极北地区的萨莫迪诸语言（涅涅茨语、埃涅茨语、已消亡的恩加纳桑语或称塔夫吉语、塞尔库普语）有亲属关系，与之共同组成乌拉尔（芬兰—乌戈尔—萨莫迪）语系。与乌拉尔诸语言相近的是正在逐渐消亡的尤卡吉尔语（西伯利亚北部）。有

些科学家认为，乌拉尔语系可与阿尔泰诸语言一起组成范围更加广泛的乌拉尔—阿尔泰语系。阿尔泰超语系包括突厥诸语言、蒙古诸语言、通古斯—满诸语言等；朝鲜语和日语（后者与朝鲜语构成阿尔泰诸语言内部的特殊紧密统一体）归属阿尔泰语系的观点还处于证实的过程中。在阿尔泰超语系中，突厥诸语言与蒙古诸语言的联系表现得尤为紧密；在突厥诸语言中，与蒙古诸语言最接近的是楚瓦什语，在某些方面楚瓦什语显示出特别的古旧色彩。

突厥诸语言（按 A. H. 萨莫伊洛维奇更加确切的分类）包括以下一些语组：1）布加尔语组，楚瓦什语属于该组；2）西南语组，包括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和其他语言；3）西北语组，包括鞑靼语、哈萨克语、巴什基尔语、卡拉伊姆语、库梅克语、诺盖语、卡拉卡尔帕克语，以及和阿尔泰语构成吉尔吉斯—克普恰克专门语组的吉尔吉斯语；4）东南语组，包括乌兹别克语（排除其被归入专门语组的某些克普恰克方言）和现代维吾尔语；5）东北语组，属于该组的有雅库特语和西伯利亚、阿尔泰的其他一些语言，以及一些拥有远古文献遗存的已消亡的突厥语言[古回鹘语（古突厥语）和叶尼塞—鄂尔浑文字语言]。现代蒙古诸语言包括布里亚特语、蒙古语、阿富汗莫戈勒语、中国东北部的达斡尔语、中国蒙古语（青海湖区域，即土族语，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 年））。通古斯—满语包括濒危的满语、埃文基语、与埃文基语接近的埃文语和东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其他一系列语言。

日语与琉球语（琉球群岛）有近亲关系。但是，日语和琉球语在世界诸语系中的地位仍不十分清楚，它们不仅与阿尔泰诸语言，而且与马来—波利尼西亚诸语言都有共同的特征。

印度（主要是印度南部）的绝大多数人口使用达罗毗荼语系（参见**达罗毗荼诸语言**）的语言，包括泰米尔语、与其相近的马拉雅拉姆语和坎拿达语，还有泰卢固语、库伊语、贡迪语、布拉会语（印度西北部）等。根据苏联、芬兰和美国研究者解读，公元前第三千年原始印度文化简短碑铭文本是用与原始达罗毗荼语（或称共同达罗毗荼语）相近的语言书写的。这令人信服地证明，人们曾多次提出的关于远古达罗毗荼诸语言和乌拉尔诸语言以及已消亡的埃兰语（西亚的古老语言之一）有亲缘关系的假说是正确的。

根据 B. M. 伊里奇-斯维蒂奇论据十分周详的假说，印欧、亚非、卡特维尔、乌拉尔、阿尔泰和达罗毗荼等诸语言共同构成诺斯特拉超语系（亦称“博列伊”或“博列阿尔”超语系，参见**诺斯特拉诸语言**）。有些学者把楚科奇—勘察加语系的诸语言（楚科奇语、科里亚克语、阿柳托尔语、伊捷尔缅语等）也纳入其中。发生学联系至今尚不完全清楚的某些欧亚地区语言（特别是格林伯格假说提及的尼夫赫、阿伊努、爱斯基摩—阿留申等语言），虽然不排除它们有可能属于诺斯特拉超语系（格林伯格所谓的“欧亚超语系”），但概率更高的是，此外的很大一部分欧亚语言属于其他语系。

许多研究工作者认为，北部高加索语言不过是些残余，它们的前身曾经是一个范围宽广得多的语系。

北部高加索诸语言包括阿布哈兹—阿迪格诸语言（西北部高加索语言）和纳赫—达吉斯坦诸语言，即东北部高加索语言。阿布哈兹—阿迪格语族（参见**阿布哈兹—阿迪格诸语言**）包括组成阿布哈兹—阿巴津次语族的阿布哈兹语和阿巴津语、组成切尔克斯次语族或称阿迪格次语族的阿迪盖语和卡巴尔达—切尔克斯语、乌贝赫语，以及已消亡的哈梯语（公元前二千年因楔形文字古文献而为人所知，与阿迪格语极为相近）。

纳赫—达吉斯坦诸语言一般分为纳赫诸语言或称车臣—印古什诸语言（车臣语、印古什语、巴茨比语）和达吉斯坦诸语言（达吉斯坦境内的约 30 种山地语言），其中，达吉斯坦诸语言包括阿瓦尔—安季—策扎次语族（使用最广泛的是阿瓦尔语）、拉克—达尔金次语族（达尔金语和拉克语）、列兹金—塔巴萨兰次语族（列兹金语、塔巴萨兰语及许多其他语言）。与东北部高加索诸语言（特别是与其中的纳赫次语族）相近的是现已消亡的胡里特语（公元前三千年至公元前两千年的文本出土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小亚细亚、叙利亚北部）和乌拉尔

图语（公元前一千年乌拉尔图国位于历史上的亚美尼亚境内），胡里特语和乌拉尔图语构成胡里特—乌拉尔图次语族（人们尝试将埃特鲁斯语归入该次语族）。

根据早前提出并且后来得到严谨验证的推测，北部高加索语系与**叶尼塞诸语言**具有亲属关系，北部高加索语系曾一度被与叶尼塞诸语言一起归入一个十分庞大的语言统一体，即叶尼塞—北高加索语言统一体。属于叶尼塞语系的有叶尼塞河流域数个村落住民使用的克特语（叶尼塞—奥斯加克语）以及几种与之有亲属关系的西西伯利亚消亡语言（科特语、阿桑语及其他语言）。不少学者认为，叶尼塞（克特）诸语言与藏缅语言也有亲属关系。

汉藏语系（有些学者对该语系语言的一致关系持异议）中的藏缅语族（参见**汉藏诸语言、藏缅诸语言**）包括拥有极其宝贵的中世纪（自8世纪）古文字遗存的藏语、与其有近亲关系的诸藏区方言、古文字遗存同样源于中世纪的缅甸语，以及其他与缅甸语构成紧密统一体的傩语—缅甸语言，如阿卡语、利苏语等。唐古特语也属于藏缅诸语言，大量撰写于中世纪的唐古特语文本不久前才得以解读。与藏缅语族密切关联的还有克钦诸语言（景颇语或称克钦语；缅甸和中国西南部）。属藏缅诸语言的还有博多—加罗语支（博多语或称博罗语等，用于印度阿萨姆和其他一些邦）、西部喜马拉雅语支（尼泊尔西部），其中博多—加罗语支包括钦（库基—钦）次语支的各个语言。汉藏诸语言还包含研究得很不充分的若尔盖语支（在四川、甘肃及周围山区）。有推测认为，列布查语（在锡金）是其他汉藏诸语言中与汉语相对来说最接近的。

不过，汉语（重要词汇与藏缅诸语言共同）较之汉藏语系其他所有语言，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汉语就其词汇而言，与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致与该语系所有语言的共同祖语的分离时间可以追溯到不迟于公元前第五千年（中国北部发现的汉语书面文本，即在甲骨上刻写的用于占卜的铭文，始于公元前第二千年末；通过对比晚近时期的各种方言和早期借入其他语言的词汇，使我们得以复原以象形文字传承的古汉语历史音韵）。数量繁多的汉语方言可归纳成4种主要方言：数量最多的北方方言（中亚的东干语与其有历史关联）和吴、粤、闽方言（按另一种分类法则有7种）。有些研究者曾提出过假设：北美洲的纳—德内诸语言与汉藏语系是连接起来的，而与该地区其他阿美林德语有本质的区别。这种观点逐渐演变为构建一个超语系共同历史比较语法的尝试，这个超语系除大量非诺斯特拉欧亚语言（约定名称为“雅弗”，参见“**语言新学说**”）；包括北高加索诸语言和与其有亲属关系的古代东方诸语言——哈特语、胡里特语以及可能与其相关联的埃特鲁斯语（使用者先前由小亚细亚迁至意大利），或许还有苏美尔语、叶尼塞诸语言、结构上与叶尼塞诸语言相近的西班牙巴斯克语和喜马拉雅山区布鲁沙斯基语、汉藏语系诸语言）外，还包括隶属北美洲纳—德内语系的语言（阿塔帕斯克语族中的阿美林德诸语言以及正在消亡的埃亚克语、特林基特语；对印第安海达语是否属于这一语系最近一段时间尚有争议）。北美洲纳—德内语系的源头位于阿拉斯加以南。认为该语系来到新大陆要晚于其他所有的阿美林德语，也未尝不可。根据这一“雅弗”语新假说，后来称为纳—德内语系的群体迁至新大陆前，整个这一超语系的起源更可能的应是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起始时代）的中部亚洲地区。一部分方言的使用者可能由中部亚洲迁居至靠近西部的地区，与高加索及其南面相邻地区的一部分诺斯特拉诸语言的使用者开始发生早期的接触。这一非诺斯特拉超语系的另一部分方言一直扩展（人搬家，语言随着走；不是语言走，人不走）到欧洲西部（如果巴斯克语一方面与北高加索诸语言，另一方面与叶尼塞诸语言和布鲁沙斯基语有共同语法特征，而且苏美尔语中也存在这些共同语法特征，那么这就足以将所有这些语言都纳入到该超语系之中），这发生在后来几波印欧人移民定居欧洲（尤其是西欧）之前，这一印欧人群体是从诺斯特拉诸方言使用者的总群体中分离出来，在西亚集结形成的。中部亚洲完好保存下来的那部分“雅弗”超语系语言，是人类早期在大部分中亚地区开始居住的标记，那里的水文地理名称证明，操叶尼塞诸语言者曾在现代哈萨克斯坦境内生活过（由西亚诺斯特拉语分布区分离出来的印欧、土耳其和乌

拉尔方言的使用者开始经中亚迁居之前)。这样的话，布鲁沙斯基语和部分藏缅语言就可以认为是早期中亚语言分布区遗留下来的语言了。而藏缅语言其他分支的使用者，如操汉语和纳—德内语系者，很早之前就迁往东方和东北方了。人们推测，远自公元前四千年—公元前三千年，中国人的直系祖先就已经居住在长江以北的地区了。但是，虽然有大量事实佐证这里所描述的超语系诸方言使用者古代的迁徙图景，但这个超语系总体上的统一关系及其使用者们的迁徙特点依旧只是假设性质的（较之诺斯特拉超语系统一关系的假设程度更大，后者的解体时间较晚）。东亚和东南亚诸语言的准确分类引起的争议更大。

苗瑶语（中国西南部、泰国和越南北部）因有大量时代相当久远的借词，较早前曾被划归汉藏语系。约在公元前两千年—一千年之交，由于与苗瑶语有远亲关系的部分泰语言（侗—水次语族）使用者的迁移，操苗瑶语者分成苗、瑶两族。有推测认为，苗瑶语、泰诸语言、加岱诸语言（有时被划归较广义的泰语族）和澳斯特罗尼西亚诸语言（早期被称为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共同构成统一的澳泰超语系。澳泰超语系的解体应不晚于公元前五千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其中，纯泰次语族包括：彼此接近的诸西南泰语言（泰语或称暹罗语、老挝语、掸语、阿霍姆语），远在中世纪就使用这些语言创建了首批书面文本；诸东北泰语言（或称诸北泰语言），包括北壮方言（中国南部）和布依语；诸中泰语言（侬语和南壮方言）。侗水语族更接近于西南泰语分支，但是侗水语族的分离时间一般被确认为在秦汉之前（根据西南泰语、侗水语中古汉语借词的年代）。侗—水语族与纯泰诸语言（或按另一术语系统称作壮傣语）有联系。黎语、拉嘉语、仡佬语和其他语言组成澳泰超语系的加岱语族。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是否属于澳泰超语系的问题仍有争议。

根据澳泰超语系假设，澳斯特罗尼西亚诸语言与苗瑶诸语言、泰诸语言、加岱诸语言之间关系特别接近，这可以通过占诸语言（越南南部的一组澳斯特罗尼西亚语言，包括以古占婆国文字闻名近一千五百年的占语和嘉莱语等）的特点加以验证。但对于共同占语及其后来的许多演变成现代诸占语的方言而言，有一些特征则可以用它们后来与亚洲东南部其他语系各种语言的接触来加以解释。除占语支外，属于澳斯特罗尼西亚诸语言的还有北澳斯特罗尼西亚语支（台湾的邹语和其他一些结构颇为古旧的澳斯特罗尼西亚语言；其中的一些已经完全消亡，另外一些使用者也屈指可数）、包容面十分宽广的印度尼西亚语分支（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爪哇语、巴塔克语、达雅克语以及其他一些印度尼西亚语言，他加禄语以及其他一些菲律宾语言，马达加斯加岛上的马拉加西语等）。由于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的初始词汇中有大量表示沿海生活的特有单词，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的原始发祥地可以认定为或者是其北部分布地区（中国东部、台湾），或者是某个大型岛屿（可能是爪哇岛）。由于较晚时期几次东迁（大约发生在进入公元前第五个千年的时期）的缘故，分布到大洋洲的波利尼西亚诸语言和美拉尼西亚诸语言都与印度尼西亚语相近。

日语（和与其相近的琉球语）中那些明显将其与澳斯特罗尼西亚语连接在一起的特征和日语中的阿尔泰语言（归根结底是诺斯特拉诸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至今仍是一个谜。毫无疑问，一系列澳斯特罗尼西亚语语素渗透到了日语之中，就像渗透到阿伊努语中那样（似通过古日语），但是这些语素与源自阿尔泰语语素的对应关系程度和性质还有待确切说明。澳斯特罗尼西亚诸语言总体上在古代已具备隶属澳泰语系的属性，它们与澳斯特罗尼亚超语系语言有着很多共同特点。依据澳泰语假说，之所以有这些共同特点，是由于澳斯特罗尼西亚语中存在古澳斯特罗尼亚底层语的缘故；这样的话，澳斯特罗尼西亚诸语言就是从东南亚扩展开来的。根据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假说，澳斯特罗尼西亚语属于一个包括澳斯特罗尼亚诸语言在内的澳斯特里克超语系。澳斯特罗尼亚诸语言包括：越芒诸语言（越南语及越南境内与之有亲属关系的几种语言），它们有一个与泰诸语言共同的规模可观的（底层语？）词层；或许还有塞芒—凯撒次语族诸语言，但它们的谱系关系尚未完全厘清；孟—高棉诸语言（与老挝巴拿语支相近的柬埔寨高棉语和孟语支语言），它们与苗瑶语有一定的

联系（可能是晚近时期频繁接触的缘故）；崩龙—佉诸语言（崩龙语、梁语、缅甸佉语、泰国拉瓦语、喀语、偏语以及老挝和中国南方的一些山区语言）；孟加拉国的卡西语，由于大约公元前四千年至三千年汉藏部落（克伦人和钦人）的迁徙，卡西语很早就和崩龙—佉语相分离；蒙达诸语言（在印度东北部和中部构成同一语支的桑塔利语、蒙达里语和霍语；卡里亚语以及加尔各答以西的一些亲属语言；再向西的库尔库语；构成一个单独语支的萨瓦拉语或称索拉语）。印度有一些其他语言与这些语言的关系尚不清楚，特别是印度中部的纳加利语以及尼科巴群岛的尼科巴语（有时被认为同崩龙—佉语和孟—高棉语相近）。不仅在澳斯特罗尼西亚语中，而且在古汉语中，也发现了澳斯特罗亚细亚底层语，这一情况也时常被作为论据，用以反对古汉语与藏缅语可确定无疑合并为同一语系的观点；然而，这些澳斯特罗亚细亚语词汇更是在操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某种方言的民族居住在长江流域的河谷地区（长江这个名称本身就是来自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时被引借到古汉语中的，而那时操古汉语的另一些民族则生活在更北部的地区。

依据不久前才提出的印度—太平洋假说，安达曼群岛上的一种濒危语言（有时将其与归属于澳斯特罗亚细亚语系的萨凯语作比照）与新几内亚及相邻岛屿上的绝大部分语言（被约定称为巴布亚诸语言）有亲属关系。可能印度—太平洋超语系中也包括某些被认为是澳斯特罗亚细亚语系的其他一些语言（比如萨凯语）。在其余的“巴布亚”语言中可以划分出若干暂时不互相隶属的语组。但是它们之中的一部分语言可能应当与澳大利亚诸语言并合，共同构成一个其整体性毋庸置疑的统一的澳大利亚语系。

依据新的分类尝试，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居民主要使用两种超语系语言：由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刚果—科尔多凡语系）和尼罗—撒哈拉语系构成的刚果—撒哈拉超语系（较早的术语系统称为“苏丹语系”）以及孤立存在的科伊桑超语系。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由尼日尔—刚果和科尔多凡两个语族构成。尼日尔—刚果语族中有一个涵盖很广的贝努埃—刚果次语族，包括类班图诸语言（班图诸语言也属其中），班图诸语言中最主要的语言有斯瓦希里语、卢旺达语、刚果语、隆迪语、卢巴语、卢干达语、林加拉语、谢索托语和（伊西）祖鲁语。蒂夫语是苏丹境内东部类班图诸语言中地域分布最广的语言。一些学者认为，班图诸语言和苏丹的类班图诸语言同属于尼日尔—刚果语族，一方面，与亚非诸语言相关联，另一方面，又同苏丹的一些科尔多凡语言（刚果—科尔多凡诸语言）相关联。与班图诸语言和类班图诸语言有显著差别的是贝努埃—刚果诸语言内部的下列语支：平原或称高原语支（坎巴里—雷舍语、皮蒂语、比罗姆语等）、类朱孔语支、克罗斯里维尔语支（博基语等）。尼日尔—刚果语族内部的其他次语族中还有阿达马瓦诸语言（图拉—克穆语、昌巴—蒙巴拉语、达卡塔赖语、维雷—杜鲁语、穆穆耶—津纳语、达马卡里语、荣古尔—罗巴语、卡伊语、伊延—蒙加语、隆古达语、费利语、宁巴里语、布亚—霍别语、马萨语）。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的东部语言包括：格巴亚—恩格巴卡语、班达语、恩格班达—耶科马语、赞德—潘比亚语、恩格巴卡—马博语（班格巴语）、恩多戈—曼加尔语、马迪—敦戈语、曼敦加—姆巴语。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还包括：西部大西洋次语系（富拉语、沃洛夫语、基西语等）；曼迪次语系（马林克语、班巴拉语、索宁克语、门德语等）；沃尔特次语系（莫西语或称莫雷语、格鲁西语、洛博语等）；克瓦次语系（阿坎语、埃维语、约鲁巴语、伊博语等）。一些类班图语言（比如蒂夫语）、“西尼格里特”诸语言（阿达马瓦语、乌班吉语、科尔多凡诸语言）以及克瓦诸语言，近来常被用于作为论据，证明很久之前曾经提出过的假说——所有的“苏丹”（“刚果—撒哈拉”）语言，包括尼罗—撒哈拉诸语言在内，是一个统一体。尼罗—撒哈拉语系包括沙里—尼罗语族、中部苏丹语族以及北部（邦戈—格贝里语、萨拉语、瓦勒语、布巴马语、克雷什语、宾查—卡拉语）和东南部苏丹语族（莫路—马迪语、坎格别鲁—阿卢亚语、芒布鲁—埃费语、伦杜语）。据推测，桑海、撒哈拉、马巴、富尔、科马等语族都是各自独立的语族。如果不久前重新开始的论证“所有刚果—撒哈拉语言（苏丹诸语言）是一

个“统一体”假说的工作得以成功的话，那么这将为研究两大语言集合之间的相互联系开辟非常广阔的前景；这两大语言集合一方面是北非和欧亚毗连地区的各种语言[这些语言总体而言都属于诺斯特拉超语系中的亚非（闪米特—含米特）语言]，另一方面是撒哈拉以南的各种非洲语言。在亚非诸语言和贝努埃—刚果诸语言（尤其是班图语和其他类班图语言）之间发现了某些相似特征，如果这些特征无法解释为是这些语言在非洲大陆晚近时期相互影响结果的话，那么就可能是时间非常遥远的、古老的那些亲属联系（归根结底是在诺斯特拉超语系与刚果—撒哈拉诸语言之间）的表现。

霍屯督诸语言在非洲南部占据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它们和布须曼诸语言常常被合并称之为科伊桑诸语言。科伊桑诸语言还包括其他几种东非语言（桑达韦语、哈扎语）。或许恰恰是科伊桑诸语言呈现了非洲远古住民所持语言的特征（就像叶尼塞诸语言及其一些亲属语言是欧亚很大部分地区早期住民所持语言的残余一样）。南部非洲所谓俾格米诸语言的研究十分薄弱（术语本身就像“巴布亚”诸语言一样，带有约定的性质）。

西伯利亚北部和远东地区部分语言的名称，如“古西伯利亚”诸语言或称“古亚细亚”诸语言，也是不具有现实分类意义的约定符号。人们将叶尼塞诸语言称之为西部“古西伯利亚”语言，是因为认清了叶尼塞诸语言和北高加索诸语言及其他一些与北高加索诸语相近语言之间是有联系的（叶尼塞诸语同与乌拉尔语相近、因而也与诺斯特拉语相近的“古亚细亚”尤卡吉尔诸语之间存在各别相似性，这可能是由于在西伯利亚以及接壤地域晚近时期接触的缘故）。像楚科奇—科里亚克诸语言（楚科奇语、科里亚克语、伊捷尔缅语）这样的古亚细亚语言都可以归入诺斯特拉超语系中（虽然这一假说只有部分研究者接受）。

类似的假说在讨论尼夫赫（吉利亚克）语时也曾提出过，但涉及的可能只是一些个别外来词（与东亚和远东其他语言共同的）的借入问题。在东亚诸语言中，孤立存在的还有阿伊努语（日本北部），常常被拿来同美洲印第安诸语言作对比（就像叶尼塞诸语言一样）。爱斯基摩语是阿留申语或称乌南甘语的近亲语言，广泛分布在东北亚、北美和格陵兰岛的沿海地区。也许，这是自“旧大陆”至北美最后几波移民浪潮中的一波留下的遗迹。近来，爱斯基摩—阿留申语与印欧语以及整个诺斯特拉超语系的对比研究越来越多。除了与“旧大陆”两个囊括广泛的超语系接近的爱斯基摩—阿留申诸语言和纳—德内诸语言外，与诺斯特拉超语系进行对比的美洲原住民语言还有佩努蒂亚语系的语言（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北部的温顿语和其他语言）。但是这里所谓的联系性质，更加可能的是，只表明这些阿美林德语言在到达北美之前（更确切地说在西伯利亚疆域）曾与乌拉尔—尤卡吉尔诸语言发生过相互影响（这里言及的可能只是语言接触所产生的痕迹，而不是语言的亲属关系）；与此同时，一部分共同词汇成分也可以在叶尼塞语中找到平行现象。其他曾经作过的“旧大陆”语言和阿美林德语言之间（比如突厥诸语言和南美克丘亚语）的对比研究，涉及的只是各别的一组组彼此孤立的词，无法由此得出可能存在语言亲属关系的确定结论。

大部分北美洲的语言都结合成大规模的超语系，它们相互之间可能最终都有亲属关系。属于这些超语系的（除了孤立的纳—德内诸语言）有阿尔冈基亚—莫桑超语系，或称阿尔冈基亚—瓦卡什超语系。根据众多分类法之一，该超语系由阿尔冈基亚诸语言和瓦卡什诸语言组成。其中阿尔冈基亚诸语言是研究得最深入的语系，包括里特万次语族（加利福尼亚太平洋沿岸的尤罗克语和维约特语）、加拿大和美国的阿尔冈基亚语族（克里语、奥杰布瓦语、梅诺米尼语、福克斯语和其他语言）。瓦卡什诸语言（努特卡语、夸扣特尔语和温哥华岛及大陆相邻地区的贝拉贝拉语）、切马孔语（部分已经消亡）和极其古老的萨利什诸语言（舒斯沃普语、卡利斯佩尔和其他一系列语言）一起构成莫桑语系。有推测认为，阿尔冈基亚—瓦卡什诸语言（阿尔冈基亚—莫桑诸语言）与库特奈诸语言（加拿大边境地区）、加尔弗诸语言之间也有特殊的联系（加尔弗诸语言进而区分为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的穆斯科吉—纳切兹语族、纳切兹次语族和乔克托—阿拉巴—克里克次语族；已经消亡了的图尼卡语和

路易斯安那州同一语族的另外两种语言是孤立存在的)。霍卡—苏超语系所占地域十分辽阔，分为霍卡和苏两组语言。霍卡语组包括雅纳语和一系列其他语言，以及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尤马诸语言，墨西哥、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一些各别语族。苏语组包括拉科塔语、克劳语、北美大草原的其他一些语言以及消亡了的东南语族。近来，人们将易洛魁诸语言、卡多诸语言与霍卡—苏诸语言合并在了一起。尤基—佩努蒂亚超语系包括尤基语（之前被错误地划归霍卡—苏超语系中）和佩努蒂亚诸语言[温顿语（常像尤基语那样被拿来与乌拉尔—尤卡吉尔诸语言作对比）、米沃克语、迈杜语和其他一些加利福尼亚州中部语言]；整个超语系的统一性受到一些美国学者质疑。阿兹特克—塔诺超语系（或称塔诺—犹他—阿兹特克超语系）涵盖犹他—阿兹特克诸语言（其中的古阿兹特克国语言拥有前哥伦布时期墨西哥的象形文字古文献遗存和持续时间很长的晚期文献传统）；还有新墨西哥州的塔诺语和俄克拉何马州的基奥瓦语。在中美洲特，别重要的是玛雅—索克超语系，它由玛雅语系和米赫—索克语系构成，其中玛雅语系包括玛雅语（大量已被部分破解的前哥伦布古代铭文和手稿，以及一系列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彼此相对接近的其他语言；米赫—索克语系包括一些已经消亡的语言，以及墨西哥特万特佩克半岛上的米赫语、索克语和波波卢卡语）。这个超语系还包括瓦维诸语言（特万特佩克半岛太平洋沿岸）和托托纳克语族（其中有墨西哥的托托纳克语和特佩华语）；但这一假说遭到质疑。

根据阿美林德假说，阿尔冈基亚—莫桑超语系、尤基—佩努蒂亚超语系、塔诺—犹他—阿兹特克超语系和玛雅—索克超语系不仅相互之间，而且还同下列南美洲主要超语系有亲属关系：阿拉瓦克超语系（一组分布于圭亚那、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广阔地域的语言）；雅诺马诺—帕诺—塔卡诺超语系（包括从尼加拉瓜到哥伦比亚疆域的奇布查语系、分布极广的南美洲印第安人的克丘亚语——从前印加王国的基本语言，以及在秘鲁和玻利维亚广泛使用的艾马拉语）；图卡诺超语系（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西）；维托托超语系（哥伦比亚各个独立部落的语言）；图皮—瓜拉尼超语系（一组分布于圭亚那、巴西、玻利维亚和阿根廷广阔疆域的语言，纳入其中的还有巴拉圭的主要语言瓜拉尼语和曾于公元 16—17 世纪之交在巴西东部沿岸用于部落、民族之间交往的图皮—南巴语）；吉超语系（包括许多支巴西印第安语言）。雅诺马诺—帕诺—塔卡诺、阿拉瓦克、图皮—瓜拉尼等诸语言常常被结合起来，组成安第斯—赤道超语系。关于加勒比诸语言（委内瑞拉和圭亚那）的地位问题，至今悬而未决。根据阿美林德假说的众多方案之一，加勒比诸语言不属于统一的阿美林德语系，阿美林德语系应在主体移民落户美洲之后很快就解体了。美洲南部和中部种类繁多的语言（也包括部分北部语言）中，尚有一些研究得不够充分，因此，它们的分类具有约定性质，约定的程度不低于“旧大陆”的巴布亚诸语言和俾格米诸语言。

早前在提出关于所有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无一例外地彼此间都有亲属关系的假说时，M. 斯瓦迪士曾推测说，世界上所有现代语言都起源于数万年前“旧大陆”某一语系的各种方言（按照斯瓦迪士的说法，在当时还存在其他的一些语系，只不过后来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斯瓦迪士和现代语言学（参见**语言年代学**）广泛使用的确定语系解体时间的方法，未能对超过 4000—5000 年之前的语言解体时间作出可靠的结论，因此，斯瓦迪士（以及之前的 A. 特龙贝蒂）关于美洲和“旧大陆”所有语言单源发生（单一起源）的各种结论都不可靠。但与此相反，近年来的研究却使人们得以将“旧大陆”和新大陆几乎所有从前已知的主要语系合并成为数相对不多的超语系，它们之间毕竟可以发现一些联系。近年来语言谱系分类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使人们可以作出论据更加充分的推测，因为我们起码可以把大部分已知的语言（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在谱系上联成一体。

世界上还有大量语言尚缺少足够研究，这是对世界语言早期历史作最终结论的障碍。可以这样认为，大多数的语系只保留在一些个别的地名和借词中，或者说它们已消失殆尽；有些远古语言的文献遗存（比如，克里特语的象形文字）至今未得到破解。人类的有些极其古

老文明语言（如苏美尔语、埃特鲁斯语），在语言谱系分类中至今未找到大家公认的位置，虽然在这方面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

美洲、非洲、东南亚、新几内亚和大洋洲语言的分类，在很多方面尚未得到细致的研究。因此，现代科学描绘的人类语言历史图景，还只是十分概略的。

- Шор Р. О., Чемоданов Н. С.,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 М., 1945.
- Народы Африки, под ред. Д. А. Ольдерогге, И. И. Потехина, М., 1954.
- Иванов В. В., Генеалогическая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языков и понятие языкового родства, М., 1954.
- Индейцы Америк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М., 1955.
- Народы Австралии и Океании, М., 1956.
-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А. А.,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2 изд., М., 1960;
- Язык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т. 1—5, М., 1966—1968.
- Иллич-Свитыч В. М., Опыт сравнения ностратических языков, т. 1—2, М., 1971—1976.
- Брук С. И., Эт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м мире, «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1976, № 3.
- Его же, Население мира. Эт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 2 изд., М., 1986;
- Языки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т. 1—3, М., 1976—1979.
- Яхонтов С. Е., Языки Восточной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в IV—I тысячелетиях до н. э., в кн.: Ранняя этн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М., 1977.
- Кетский сборник. III.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этнография, мифологи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М., 1982.
- Finck F. N., Die Sprachstämme des Erdkreises, 3 Aufl., Lpz., 1923.
- Schmidt W., Die Sprachfamilien und Sprachenkreise der Erde, Hdlb., 1926.
- Kieckers E., Die Sprachstämme der Erde, Hdlb., 1931.
- Gray L. H.,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N. Y., 1939.
- Milewski T., Zarys językoznawstwa ogólnego, cz. 2 — Rozmieszczenie języków, zes. 1—2, Lublin — Kraków, 1948.
- Pei M. A., The world's chief languages, 3 ed., L., 1949.
- Homburger L., Le langage et les langues, P., 1951.
- Holmer N. M., Further traces of Paleo-Eurasian, «International Anthropological and Linguistic Review», 1953, v. 1, № 2—3.
- Greenberg J. H., 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New Haven, 1955.
- Его же,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unwritten languages, в кн.: Anthropology today, Chi., 1953.
- Его же, The general classification of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n languages, в кн.: Men and cultures. Selected paper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Phil., 1960.
- Его же, The languages of Africa, 2 ed., The Hague, 1966.
- Его же, Language in the Americas, Stanford, 1987.
- Hamp E. P., Selected summary bibliography of language classification, «Studies in linguistics», 1960, v. 15, № 1—2.
- Les langues du monde..., sous la direction de A. Meillet et M. Cohen, [nouv. éd.], t. 1—2, P., 1964.
- Bodmer Fr., Die Sprachen der Welt, 3 Aufl., Köln—B., 1964.
- Voegelin C. F., Voegelin F. M., Languages of the world,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965, № 6—7.
- Haas M. 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of languages, The Hague, 1969.
- Goddard R. H., Algonquian, Wiyot and Yurok: proving a distant genetic relationship, Indo-European studies II, Camb. (Mass.), 1972.
- Gregersen E. A., Kongo-Saharan, «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s», 1972, v. 11, pt 1.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Amerindian languages, The Hague —P., 1972.

Swadesh M., The origi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language, L., 1972.

Ego же, Tras la huella lingüística de la prehistoria, Méx., 1960.

Ego же, Mapas de clasificación lingüística de México y las Américas, Méx., 1959.

Ohly R., Języki Afryki, Warsz., 1974.

Köhler O., Geschichte und Probleme der Gliederung der Sprachen Afrikas, в кн.: Die Völker Afrikas und ihre traditioneller Kulturen, Tl 1, Wiesbaden, 1975.

Benedict P. K., Austro-Thai and Austroasiatic, в кн.: Austroasiatic studies, Honolulu, 1976.

Ego же, Vocalic transfer: a Southeast Asia areal feature, в кн.: Acta Orientalia, v. 40, Cph., 1979.

Chafe W. L., The Caddoan, Iroquian and Siouan languages, The Hague, 1976 (Trends in linguistics, v. 3).

Sadovszky O. J., 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Uralo-Penutian research, в кн.: Ural-Altäische Jahrbücher, Bd. 48, Wiesbaden, 1976.

Norman J., Tsu-lin Mei, The Austroas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 Some lexical evidence,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1978, v. 32 (1976).

Levine R. D., Haida and Na-Dene: a new look at the evid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1979, v. 45. № 2.

Mukarovskiy H. G., Bantusprachen und Sudansprachen, «Afrika und Übersee», 1979, Bd 62, H. 2.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原苏联各民族的语言 (Язык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原作者: Ю. Д. 杰舍里耶夫 (Ю. Д. Дешериев); 译者: 刘永红, 华中师范大学]

指生活在原苏联 (简称苏联) 境内的各个民族所使用的不同语言。苏联有约 130 种原住民族的语言, 这些民族居住在 15 个加盟共和国、20 个自治共和国、8 个自治州和 10 个自治地区; 另外还有数十种语言, 操这些语言的民族主体居住在苏联境外的各自国家中。

苏联各民族语言在社会功能领域、来源、类型、每种语言的使用人数、有无文字和文字传统, 以及文字的形式基础等方面彼此相互区别。在苏联, 最发达、最普及的语言是俄语。俄语是苏联的官方语言, 承担着族际交往手段的功能, 是世界性语言之一。

苏联各民族的语言按其来源 (发生学上的亲属关系), 分属于以下语系和语族:

I. 印欧诸语言: 1. 亚美尼亚语; 2. 波罗的诸语言——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 3. 东斯拉夫诸语言——白俄罗斯语、俄语、乌克兰语; 4. 日耳曼诸语言——依地语; 5. 伊朗诸语言——俾路支语、帕米尔东部伊朗诸语言、库尔德语、奥塞梯语、塔吉克语、塔雷什语、塔特语、雅格布诺语; **帕米尔诸语言:** 舒格南—鲁尚语族——巴尔坦语、奥罗绍尔语、鲁尚语、舒格南语; 瓦罕语、伊什卡希姆语、亚兹古列姆语; 6. 新印度诸语言——茨冈语; 7. 罗曼诸语言——摩尔多瓦语。

II. 高加索 (伊比利亚—高加索) 诸语言: 1. 阿布哈兹—阿迪格诸语言——阿巴津语、阿布哈兹语、阿迪格语、卡巴尔达—切尔克斯语; 2. 卡特维尔诸语言——格鲁吉亚语、赞德语、斯万语; 3. 达吉斯坦诸语言——阿瓦尔语; 安季诸语言——安季语、阿赫瓦赫语、巴格瓦林语 (或称夸纳金语)、博特利赫语、戈多别林语、卡拉京语、京金语、恰马林语、达尔金语、拉克语; **列兹金诸语言——**阿古尔语、阿尔钦语、布杜赫语、克雷兹语、列兹金语、鲁图尔语、塔巴萨兰语、乌金语、希纳卢克语、查胡尔语; **策扎诸语言——**别日京语 (或称卡普钦语)、基努赫语、贡吉布语 (贡扎尔语、洪扎尔语、纳哈金语); 赫瓦尔申语、策扎语; 4. 纳赫诸语言——巴茨比语、印古什语、车臣语。

III. 汉藏诸语言: 东干语。

IV. 蒙古诸语言: 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

V. 古亚细亚诸语言: 楚科奇—堪察加语族——阿留托尔语、伊捷尔缅语、克列克语、

科里亚克语、楚科奇语；**爱斯基摩—阿留申语族**——阿留申语、爱斯基摩语；**各自孤立的古亚细亚诸语言**——凯特语、尼夫赫语、尤卡吉尔语。

VI. **萨莫迪诸语言**：恩加纳桑语、涅涅茨语、谢尔库普语、埃涅茨语。

VII. **属通古斯—满诸语言**的有：那乃语、涅基达尔语、奥罗克语、奥罗奇语、乌德盖语、乌尔奇语、埃文基语、埃文语。

VIII. **突厥诸语言**：阿塞拜疆语、阿尔泰语、巴什基尔语、加高兹语、多尔甘语（部分学者认为该语言为方言）、哈萨克语、卡拉伊姆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卡拉恰伊—巴尔卡尔语、吉尔吉斯语、克里米亚—鞑靼语、库梅克语、诺盖语、鞑靼语、托法拉尔语、图瓦语、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新维吾尔语）、哈卡斯语、楚瓦什语、绍尔语、雅库特语。

IX. **芬兰—乌戈尔诸语言**：马里语、萨阿米语、**莫尔多瓦诸语言**——莫克沙语、埃尔齐亚语；**鄂毕—乌戈尔诸语言**——曼西语（沃古尔语）、汉蒂语；**彼尔姆诸语言**——科米—济良语、科米—彼尔姆语、乌德穆尔特语；**波罗的海沿岸—芬兰诸语言**——维普斯语、沃德语、伊若尔语、卡累利阿语、利夫语、爱沙尼亚语。

主要使用者居住于苏联境外的语言：亚述语、保加利亚语、匈牙利语、希腊语、朝鲜语、蒙古语、德语、波斯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斯洛伐克语、土耳其语、芬兰语、茨冈语、捷克语以及其他一些语言。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苏联诞生之后，各种地域方言和地方话的同化、解体、逐渐消亡的过程因社会发展（标准语的影响，经济建设掀起大规模向新兴工业区移民的影响等）而加速。但诸亲属语言相互之间在发生学关系方面，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这些语言按照**类型学**可区分为黏着语（突厥诸语言、爱斯基摩—阿留申诸语言等），黏着一屈折语（伊比利亚—高加索诸语言、部分芬兰—乌戈尔语言等），屈折语（东斯拉夫诸语言及其他某些语言等），多式综合语（инкорпорирующие языки）（楚科奇—堪察加诸语言）。苏联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密切互动并没有导致这些语言在类型学上发生什么变化。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个别音位、形态、句法特点的借用，以及词汇体系的扩展等，都没有使语言结构的变化达到由一种语言类型过渡到另一种语言类型的程度。但是在老文字、新文字和无文字的各种语言在高强度使用、发展和相互影响的情况下，不同类型的语言都获得了一些新的特点，这对于它们进一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常常可以看到一种语言的原本语音、形态、句法特征产生变化，出现新的语音、形态、句法特征（卡尔梅克语中音位[в]的随位变体转化为独立的音位[y]，瓦罕语和其他一些语言受同化作用，在借词中将那些对它们而言非典型的词首辅音组合纳入其语言结构中（如 протокол ‘记录’， пленум ‘全体会议’， критика ‘批评’），借入个别音位等；新文字语言从俄语中借入词组模式、姓氏词缀-ев/-ева 和父称词缀-евич /-евна 模式，阿留申语借入动词时间和人称变位的词缀等；发展了词汇的语义和语体系统。

每种苏联民族语言的使用人数都在发生大规模的波动。约 1.375 亿人口将俄语视为母语（1979 普查资料）。大体有 50 种语言每种使用人数不超过 3 万人。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认为本民族语言为母语的人数在增加。因此，一些外国苏联学专家和语言学家认定，苏联的民族语言和民族被同化、俄罗斯化是毫无根据的。

根据有无文字和书写传统，苏联各民族的语言可区分为老文字的语言、新文字的语言和无文字的语言。属于老文字和新文字的语言是世居苏联的 70 余个民族的语言。一些人口很少的民族（如巴茨比人）操无文字的语言，认为无须为其母语创建文字，可以使用他们周边生活的人口众多民族的标准语和族际交往语。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使用本民族的独特文字；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文字则以拉丁字母系统为基础。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苏联各民族许多语言的文字都以俄语（斯拉夫）文字形式（графика）为基础。摩尔多瓦语的

文字则决定改用拉丁文字形式。

苏维埃社会语言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首先取决于各种语言在社会功能广泛程度上的差异,亦即该语言使用者在各种不同活动领域具体表现出来的语言交际功能。苏联各民族的语言就其功能总和而言,或者就其应用领域的外延、总和而言,是不同的。例如,无文字的巴茨比语不作为教学语言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中使用;乌德穆尔语作为教学语言用于小学,但不用于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也不用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在苏联时期破天荒地开始在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和社会、自然、技术科学等领域履行教学语言的功能;俄语履行着最广泛的社会功能,其中包括族际交际语和世界语言的功能。

苏联各民族语言的发展规律性,首先体现在它们受社会制约的功能发展和内部结构发展中。社会关系中最重要和最具苏维埃时代特点的,是苏联各民族语言社会功能的发展。比如,格鲁吉亚标准语和亚美尼亚标准语功能一语体的多价性,从它们出现至今,都没有表现得像苏维埃政权期间那么全面。吉尔吉斯语和印古什语,就像仅在一个村落里使用的希纳卢格语那样,在1917年时都是没有文字的语言,大致处于同一功能发展水平,被作为母语用在日常交往、经济活动以及精神文化、宗教领域。吉尔吉斯语的文字创立于1924年,起初以阿拉伯字母表为基础,1926年改以拉丁字母为基础,自1940年起又改为俄语字母做基础;印古什语的文字是1917年十月革命后创建的,起初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自1923年起以拉丁字母为基础,自1938年改作以俄语字母为基础。到1980年,这些语言(尤其是吉尔吉斯语)的社会功能达到了很高的发展水平。许多原先是无文字的苏联各民族语言,后来都开始用在普通中小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教学领域,在公文处理、信函往来、广播电视等领域使用,以这些语言出版期刊和艺术、科学、社会政治书籍。它们服务于艺术和文化领域,以或大或小的规模通用于社会政治、科学生活及服务领域等。苏联各民族的语言出现新的使用、发展趋势,这有赖于根据语言使用者的生活需求自觉、有目的地实行了自由使用语言的**语言政策**。各加盟共和国的大部分语言都拥有国家语言的地位。

各个语言的社会功能的发展不能不对语言的内部结构产生影响。社会功能的扩展对语言内部结构的不同层面所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在词汇—语义系统和语体修辞系统中的影响,要比在语音结构、形态和句法领域中产生的影响大得多。

在词汇—语义系统中,标准语词汇单位的基本结构类型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在这些系统中出现了新的词层(主要是术语词层,比如格鲁吉亚语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科术语);在所有的标准语中形成了共同的社会政治词汇(“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苏维埃”、“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国际主义”等);各种标准语的词汇量大大丰富,以适应这些语言使用领域的扩大,比如,在苏维埃时期,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标准语中至少出现了15—20万个借用或在原有词汇基础上构造的新术语词;通过借用和将固有成分和外来成分组合的方式,构成数量相对不大的新型的词汇单位,如纳赫诸语言和阿迪格诸语言(参见**纳赫诸语言**、**阿布哈兹—阿迪格诸语言**)中的非常关系形容词类型:印古什语 *революционни кьовсам* ‘革命斗争’、阿迪格语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э* ‘社会主义的’等。

原来无文字的语言创立文字、扩展语言的社会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民族文化(以民间口头创作为基础的文学、艺术等),由此而促使新文字标准语各种不同功能语体的形成和发展,比如通过出版社会政治和政论书籍、开展期刊出版事业等形成了政论语体。社会、人文、自然和技术科学的发展,在中小学校和高等学校使用老文字、新文字语言进行教学,导致科技语体诞生。采用书面形式处理公文、收发公函、办理诉讼程序等,为公文—事务语体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文学艺术语言中的散文、诗歌、戏剧体裁也开始发展起来。因此,受社会制约的新、老文字语言各种社会功能的发展规律、各种功能语体的形成,都取决于这些

语言的使用范围，取决于标准语的口头和书面的使用性质，取决于用该语言系统、持续出版书刊的数量和体裁特点以及其他一些原因。

受社会制约的苏联各民族语言的使用、发展和相互作用规律及其社会功能扩展，虽未导致音位系统和语法系统的“瓦解”，但在这些系统中也常常产生一些由于语言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新的现象，如从俄语中，乌德穆尔语借用了音位 х, ф, ц; 吉尔吉斯语借用了 в, ф, х, ц, ч; 卡巴尔达-切尔克斯语借用了关系形容词 советскэ ‘苏联的’，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э ‘共产主义的’；在俄语的影响下，格鲁吉亚语中出现了句式 ра гирс? ‘这是什么’，取代了 рогор гирс; 图瓦语、巴茨比语出现了一些新的主从复合句类型等。

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苏联各民族语言中各种手工业者、无业游民群体的所谓社会习惯语、黑话经历了逐渐消亡的过程。苏维埃社会文化、语言生活的发展规律受社会所制约，在全民扫除文盲的情况下，排除了产生各种语言的洋泾浜语（пиджины, pidgin）化和克里奥语化（креолизации, creolization）过程的可能性（参见洋泾浜语）。

苏联各民族语言的使用、发展、相互作用的规律，首先受制于诸多社会原因。但苏联各民族语言的各种社会功能对语言内部结构的影响问题（例如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类型性）、语言社会功能的一般理论、苏联各民族语言功能和内部结构发展的相互影响等问题，都尚未得到足够充分的研究。

在苏维埃时代不仅研究了苏联所有民族的语言，也研究了几乎所有这些语言的方言（《苏联各民族的语言》，1—5卷，1966—1968年，及其他著作）。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研究苏联不同民族语言的各个方面：共时、历时、历史比较、比较对比、结构类型学、历史类型学等方面，苏联各民族语言的功能与内部结构的发展分析在不断完善。正在深入研究的还有双语问题、俄语学习和传播问题、文字的创立与完善问题、术语统一问题、语言的规范和言语修养等问题。苏联语言学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参见苏联语言学）。

Дешериев Ю. Д., Развитие младописьменных языков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М., 1958.

Его же,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языков в совет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М., 1966.

Мусаев К. М., Алфавиты языков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М., 1965.

Язык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т. 1—5, М., 1966—1968.

Білодіт І. К., Розвиток мов соціалістичних націй СРСР, Київ, 1967.

Дешериев Ю. Д., Протченко И. Ф., Развитие языков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в советскую эпоху, М., 1968.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языков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в советскую эпоху, т. 1—4, М., 1969—1976.

Исаев М. И., Сто тридцать равноправных, М., 1970.

Развит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усского двуязычия, М., 1976.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ак средство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общения, М., 1977.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и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СССР, М., 1985 (ЦСУ СССР).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斯拉夫诸语言（Славянские языки）

[原作者: С. Б. 伯恩斯坦 (С. Б. Бернштейн); 译者: 李侠, 黑龙江大学]

印欧语系的一组亲属语言（参见印欧诸语言），分布于欧洲和亚洲。使用人口总数超过2.9亿。斯拉夫诸语言的接近程度彼此差异很大，体现在词根、词缀、词的结构、语法范畴、句子结构、语义、有规律的语音对应系统、形态音位交替等方面。这种接近关系既由于斯拉夫诸语言起源相同，也由于它们在标准语和方言层面上长期、密切接触所致。但也有语言材料、功能和类型性质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是斯拉夫各个部落和民族在不同的民族、地理、历史文化条件下长期独立发展以及他们与一些亲属和非亲属族群的接触造成的。

斯拉夫诸语言，按彼此接近的程度，通常分为三支：东斯拉夫语支（俄语、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南斯拉夫语支（保加利亚语、马其顿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和西斯拉夫语支（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包括发生学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卡舒布方言在内的波兰语、上卢日支语和下卢日支语）。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小规模斯拉夫族群，也有自己的标准语，如奥地利（布尔根兰）的克罗地亚人有以查方言为基础的标准语。并非所有的斯拉夫语言都传承至今。拉贝河沿岸语在 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已消失。不同语支内斯拉夫语的划分各有自己的特点（参见**东斯拉夫、西斯拉夫、南斯拉夫诸语言**）。每种斯拉夫语都包括标准语及其所有语体、体裁等变体和各自的地域方言。各斯拉夫语中所有这些类别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是不一样的。捷克标准语比斯洛伐克标准语拥有更复杂的语体结构，但斯洛伐克语的方言特点保留得更好。有时，同一斯拉夫语各方言间的差异比独立的斯拉夫语之间的差异还大。例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的什托方言和查方言之间的形态差别，比俄语与白俄罗斯语的形态差别更悬殊。类别虽然相同，但它们的比重却常常不同，如捷克语中的指小范畴较之俄语，表达形式更多样一些，区分更细一些。

印欧语中，斯拉夫诸语言和波罗的诸语言最接近。这种相近关系为“斯拉夫—波罗的原始语”理论提供了依据。按照这个理论，一开始从印欧原始语分离出来的是斯拉夫—波罗的原始语，之后斯拉夫—波罗的原始语又解体为原始波罗的语和原始斯拉夫语。但大多数现代学者将两者的这种特殊相近关系归结为古波罗的人和古斯拉夫人长期接触的缘故。人们尚未确定，斯拉夫语序列从印欧语中独立出来的过程究竟发生在什么区域。但可以推测的是，这些区域要比各种理论认定的斯拉夫语言的一些发源地更加向南一些。这些理论虽然很多，但所有的理论都没把发源地确定在印欧原始语可能分布的地域之内。而作为现代所有斯拉夫语始祖的原始斯拉夫语，正是在当初印欧语的某个方言（远古斯拉夫语）基础上，后来形成的。原始斯拉夫语的历史比各别斯拉夫语的历史都更长久。它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结构的统一方言而发展，后来才逐渐产生各种方言变体。原始斯拉夫语及其方言向独立的斯拉夫诸语言过渡的时间，漫长而复杂。最活跃的过渡时期是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下半叶，其间在欧洲的东南部、东部形成了早期的一些斯拉夫封建国家。在这个时期，斯拉夫人的居住地大规模扩展，开发了许多地理位置和自然、气候条件各不相同的区域，斯拉夫人开始和处在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部族相互交往。所有这些都反映在斯拉夫语的历史中反映出来。

远古斯拉夫语处在原始斯拉夫语时期前，其构成成分可以借助古印欧语加以复原。原始斯拉夫语的基本成分，可借助斯拉夫诸语言不同历史时期的资料重构。原始斯拉夫语的历史，可分为 3 个时期：波罗的一斯拉夫语言紧密接触建立之前的远古时期、波罗的一斯拉夫共同体时期、方言分化和独立斯拉夫语开始形成的时期。

原始斯拉夫语的个性和特点在早期就开始形成。正是在那个时期形成了新的元音响音系统，极大地简化了辅音系统。弱化这一层级广泛扩展到元音交替领域中，词根的界限因而不受受制于古老的规定。按中腭音 k' 和 g' 的历史变迁，原始斯拉夫语属 S (satəm) 类语言 (съдѣсе, pisati, prositi, 试比较属 K (centum) 类的拉丁语 cor — cordis, pictus, precor; зѣрно, znati, zima, 试比较拉丁语 granum, cognosco, hiems)。但这个特点并没得到始终如一的体现：试比较原始斯拉夫语 *kamy, *kosa, *gqъ съ, *gordъ, *bergъ 等。原始斯拉夫语偏离印欧语类型最显著的方面，是它的形态系统；首先是动词的形态系统，名词的偏离程度要小一些。大多数后缀在原始斯拉夫语时期就已经形成。

原始斯拉夫语词汇系统的特点十分明显；远在原始斯拉夫语发展的早期，其词汇组成就经历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原始斯拉夫语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保留了原印欧语基本词汇，但同时又丧失了很多原印欧语词（如关于社会关系和自然界等领域的一些术语）。消失了很多与各种禁忌相关的词，如橡树的名称（印欧语 perkuos, 拉丁语 quercus 由此而来）曾遭禁忌，这

一古老的印欧语词根仅以多神教雷神的名字 *Перун* 保留在俄语里。斯拉夫诸语言中固定下来的 *дъ бѣ* 成为从禁忌角度考虑的一个代用词，俄语中的 *дуб*，波兰语的 *dob*，保加利亚语的 *дѣб* 等都来源于这个词。熊的印欧语称谓消失了，仅在新的科学术语 *Арктика* ‘北极’中（试比较希腊语 *ἄρκτος*）保留着；原来的印欧语词，在原始斯拉夫语中由从禁忌角度考虑的复合词 *medvěď* ‘蜜+食者’来代替。

在波罗的一斯拉夫共同语时期，斯拉夫人向波罗的人借用了许多词。这个时期原始斯拉夫语丧失了响元音，在响元音的位置上出现辅音前二合元音组合、“响元音+元音”序列（*съмьрти*，但 *umirati*），音调（锐音性和长音性）于是成为相关的特征。原始斯拉夫语时期最重要的语音变化，是丧失闭音节和 *й* 前的辅音软化。由于前一变化，所有古老的二合元音组都变成单元音，出现音节流音、鼻元音，发生音节界限的易位现象并由此导致辅音组的简化和音节之间的异化现象。这些极其古老的变化在所有的现代斯拉夫语中都留下了痕迹，反映在许多交替现象中：试比较俄语 *жать / жну, взять / возьму, имя / имена*；捷克语 *žítí / žnu, vzítí / vezmu*；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 *жећи / жмѐм, узѐти / ўзѐмѐм, иѐме / иѐмена*。*й* 前辅音软化反映在 *s / š, z / ž* 等的交替上。所有这些变化对语法构造、词尾系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й* 前辅音软化导致所谓后腭音第一次腭化：*k > č, g > ž, x > š*。以此为基础，远在原始斯拉夫语时期就已形成了 *k : č, g : ž, x : š* 的交替系列，它们给予名词、动词的构词以重要的影响。后来，后腭音的所谓第二次、第三次腭化机制开始运作，结果出现 *k : c, g : ʒ (z), x : s (š)* 的交替系列。名词有格和数的变化。除单数、复数外，还有双数，但后来双数几乎在所有斯拉夫语言中都消失了。曾有过履行定语功能的名词词干。原始斯拉夫语晚期出现了代形容词。动词有不定式词干和现在时词干。由不定式词干构成不定式、目的分词、动词一般过去时、过去未完成时、以 *-l* 结尾的形动词、以 *-vъ* 结尾的过去主动形动词和以 *-n* 结尾的被动形动词。由现在时词干构成现在时、命令式、现在主动形动词。后来，一些斯拉夫语开始用这一词干构成过去未完成时。

远在原始斯拉夫语时期，内部就已经开始有方言形成。原始斯拉夫语方言中有一组相互关系十分紧密，东斯拉夫诸语言就是在这组方言的基础上产生的。西斯拉夫语支包括三个分支：列克提克、塞尔维亚卢日支和捷克—斯洛伐克分支。方言领域区分得最详细的是南斯拉夫语支。

原始斯拉夫语是斯拉夫人历史的前国家时期使用的语言，当时氏族部落社会关系占统治地位。原始斯拉夫语实质性的变化发生在封建社会早期，这在各种斯拉夫语的进一步分化上反映出来。临近 12—13 世纪，原始斯拉夫语失去了特有的超短（弱化）元音 *ъ* 和 *ь*。它们在一些情况下消失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变成了构造完整的元音，以致各种斯拉夫语言在语音、形态系统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斯拉夫诸语言在语法和词汇系统上也经历了很多共同的变化过程。

斯拉夫诸语言在 9 世纪 60 年代第一次获得标准化加工。斯拉夫文字的创建者是基里尔（哲学家君士坦丁）和梅福季兄弟，他们应大摩拉维亚国的需要，将礼拜仪式祷文从希腊语翻译成斯拉夫语。这种新标准语以马其顿南部方言（索伦方言）为基础，但还吸收了大摩拉维亚国的很多当地语言特点。新标准语后来在保加利亚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摩拉维亚、潘诺尼亚、保加利亚、罗斯、塞尔维亚等地，使用这一语言（通常称之为古斯拉夫语）创作、翻译了极其丰富的文献。斯拉夫字母有“格拉哥里”和“基里尔”两种字母。9 世纪的斯拉夫语文本没有保存下来。最古老的是 10 世纪的斯拉夫语文本，如多布罗加碑文（943 年），萨穆伊勒碑文（993 年）等。起自 11 世纪的斯拉夫语古文献保存下来的就已经很多了。封建时代的斯拉夫标准语像通常那样，没有严格的规范。有些重要功能要依靠其他语言履行（罗斯依靠古斯拉夫语履行，捷克和波兰则依靠拉丁语来履行）。统一标准语、制定文字和语音

规范、不断扩大母语的使用范围,所有这些都是各斯拉夫民族语漫长的形成时期的特点写照。俄罗斯标准语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复杂进化,吸收了许多民间的、古斯拉夫语的成分,也受到许多欧洲语言的影响,在漫长的时间里不间断地向前发展。有些斯拉夫标准语经历的却是另外一种历史与形成过程。18世纪的捷克,已在14—16世纪就达到十分完美境界的标准语几乎消失殆尽,许多城市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德语。在民族复兴时期,捷克“启蒙者”人为地复活16世纪的语言,当时这一语言已经与民间语言相距遥远。19—20世纪的整部捷克标准语历史反映了旧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相互影响。斯洛伐克标准语的发展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它未被陈旧的书面语传统束缚,接近民间语言。塞尔维亚19世纪前占统治地位的是俄语变体教会斯拉夫语,18世纪这种语言开始了与民间语言接近的过程,19世纪中叶经В.卡拉季奇实施改革,建立了新的标准语。新语言不仅开始供塞尔维亚人使用,而且供克罗地亚人使用,因此叫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或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马其顿标准语最终形成于20世纪中叶。各种斯拉夫标准语在彼此密切交流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并且现在仍在发展中。关于斯拉夫诸语言的研究参见**斯拉夫学**。

Мейе А., Обще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 пер. с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М., 1951.

Бернштейн С. Б., Очерк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ков. Введение. Фонетика, М., 1961.

его же, Очерк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ков. Чередования. Именные основы, М., 1974.

Кузнецов П. С., Очерки по морфологии праславян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61.

Нахтигал Р., Славянские языки, пер. со словенского, М., 1963.

Вступ до порівняльно-історичного вивчення слов'янських мов. За ред. О. С. Мельничука, Київ, 1966.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лавян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языков, М., 1978.

Башкович Р., Основы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ков. Фонетика и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М., 1984.

Бирнбаум Х., Пра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 Достижения и проблемы его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пер.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М., 1987.

Vaillant A., Grammaire comparée des langues slaves, t. 1—5, Lyon —P., 1950—1977.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东斯拉夫诸语言 (Восточнославянские языки)

[原作者: В. В. 伊万诺夫 (В. В. Иванов); 译者: 惠秀梅, 黑龙江大学]

一组包括俄语、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在内的斯拉夫语言。分布在全苏境内以及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国家。原苏联的使用人口总数约为2.4亿(据1979年普查)。

公元6—7世纪东斯拉夫先人占据第聂伯河中游及其毗邻地区,他们逐渐向北、东方向迁移,一部分人迁向南方、西南方。到9世纪时,东斯拉夫人已经在“从瓦兰人到希腊人”水上贸易之路沿途,即从伊尔门湖、西德维纳河流域到第聂伯河以东(奥卡河、伏尔加河和顿河上游地区)和以西(沃伦、波多利亚和加利齐亚地区)的地带定居下来。属于东斯拉夫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族人有斯洛文人、克里维奇人、维亚季奇人、拉季米奇人、德雷戈维奇人、波利安人、德雷夫利安人、谢维里安人、乌利奇人、蒂维尔人、杜勒布人和克罗地亚人。在这片广袤的领土上定居的过程中,东斯拉夫人曾经遭遇芬兰—乌戈尔诸部落,和他们有过频繁的语言接触(参见**语言接触**)。

东斯拉夫诸语言拥有一系列在共同斯拉夫语时期形成,但又有别于南斯拉夫和西斯拉夫语言的特点:1)在辅音之间存在源自共同斯拉夫语*or, *ol, *er, *el的全元音音组-oro-, -оло-, -ере-,它们与南斯拉夫语的pa, ла, рѣ, лѣ和西斯拉夫语的po, ло, pe, ле对应,试比较俄语和乌克兰语город‘城市’, болото‘沼泽’, молоко‘奶’, берег‘岸’,白俄罗斯语горад, малако, бераг(波兰语ogród, błoto, mleko, brzeg,古斯拉夫语градъ,

блато, млѣко, брѣгъ); 2) 存在源自共同斯拉夫语音组 *tj, *dj 的辅音 ч, ж, 它们与南斯拉夫语的 шт, жд 和西斯拉夫语的 ц, дз 对应, 试比较俄语 свеча ‘蜡烛’, вижу ‘我看见’, 乌克兰语 свіча, вижу, 白俄罗斯语 свѣча, вижу (波兰语 świeca, widzę, 古斯拉夫语 свѣшта, виждж); 3) 源自共同斯拉夫语音唇音与 j 组合的、非词首唇音之后的增音 l 的出现具有规律性, 西斯拉夫语中没有这个增音, 该增音在南斯拉夫语中的出现不具有规律性; 试比较俄语、白俄罗斯语 земля ‘土地’, купля ‘买’ (波兰语 ziemia, kupiony)。

到10世纪时, 在所有东斯拉夫语的发展中, 鼻元音 o, e (o, e) 全部消失, 它们变成了 y, 'a: 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 зуб ‘牙齿’ (源自 *zobъ), рука ‘手臂’ (源自 *roka), 俄语 пять ‘五’, 乌克兰语 п'ять, 白俄罗斯语 пяць (源自 *pęть), 俄语 мясо ‘肉’, 乌克兰语 м'ясо, 白俄罗斯语 мяса (源自 *mešo)。与此不同的是, 弱化元音 ъ, ь 虽然在12—13 世纪初同时消失, 但不同的东斯拉夫语之间也表现出一些差异。俄语中 ъ, ь 在弱音位上消失, 在强音位上逐渐变成 o, e: сънь > сон ‘睡眠’, съна > сна ‘睡眠 (属格)'; днь > день ‘白天’, дня > дня ‘白天 (属格)'; крьвь > кровь ‘血’, крѣви > крови ‘血 (属格)'; слъза > слеза ‘泪滴’, слъзь > слез ‘泪滴 (复数属格)’等。乌克兰语中的固有 o, e 也发生了变化: 当 o, e 所在的音节由于随后音节失去弱化元音 ъ, ь 而变成闭音节时, 它们发音延长, 成为二合元音: конь > кōнь > куо̄нь (二合元音进而变成 и: кінь)。乌克兰语和波兰语中, 当 ъ, ь 位于 р, л 之后, 而 р, л 又位于辅音之间时, ъ, ь 变成 ы, и: 乌克兰语 крышити, 白俄罗斯语 крышыць (< крѣшити); 乌克兰语 глитати, 白俄罗斯语 глытаць (< гльтати)。

13—14 世纪之前, 东斯拉夫诸语言在形态方面都经历着共同斯拉夫语的变化过程。名词变格法按语法的性范畴重新分类; 一些旧的变格类型 (如以辅音和 *ū 结尾的古词干的名词变格) 消失; 分别以 *ō 和 *ā 结尾的硬变化、软变化变格法, 由于相互影响而使两者统一; 在同一聚合体内部, 格的各种词尾形式也相互影响; 阴性名词复数形式的词尾变化对阳性和中性名词词形变化聚合体的广泛影响不断增强, 导致名词复数变格类型中的差别实际上消失; 双数完全消失; 动物性/非动物性范畴 (始终一贯地体现在俄语中) 得到发展。短尾形容词的变格消失, 只保留了单数和复数的主格形式, 在句中做谓语。动词系统丧失了简单过去时 (一般过去时和过去未完成时) 形式、过去完成时和复合先行时形式。

到14—15世纪时, 各种东斯拉夫语言在形态方面还产生了一些彼此间相互区别的特殊现象: 俄语中呼格形式消失, 试比较乌克兰语 сыну! ‘儿子!’, друже! ‘朋友!'; 词干以 к, г, х 结尾的名词变格中, 舌根音与啞音 ц, з, с 交替的格形式被排挤掉, 如 руке ‘手臂’ (与格) 取代 руць, ноге ‘腿’ (与格) 取代 нозѣ, сохе ‘木犁’ (与格) 取代 соеѣ等; 出现了词尾为 -а 的阳性名词复数主格形式 (如 домá ‘房子’, городá ‘城市’等, 试比较乌克兰语 діми, гóроди); 以 -ите 取代 -ѣте (如以 несите ‘拿走’, ведите ‘领走’ 取代 несѣте, ведѣте), 以 к, г 取代 ц, з (以 пеки ‘烤吧’ 取代 пеци, 以 помоги ‘帮帮忙’ 取代 помози) 的动词命令式形式固定下来。根据所有的这些现象可以看出, 俄语开始有别于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

东斯拉夫诸语言的共同词汇基础是从原始斯拉夫语继承而来的词汇, 这些词汇中可发现一些南斯拉夫和西斯拉夫语言所没有的、仅东斯拉夫语独有的成分 (可以推测, 在6—7世纪时, 东斯拉夫语与其他斯拉夫语之间就已经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斯拉夫语词汇是不同的了), 还有一些词产生于相对较晚的时期各别的东斯拉夫语言中。东斯拉夫诸语言词汇系统的特点, 是有大量源自不同语言的借词。俄语中有源自东方语言 (突厥—蒙古语) 的古代借词、源自西欧各种语言 (首先是法语、德语, 还有现代英语) 的较新借词。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则表现出受波兰语词汇的较大影响。

从10世纪末起, 随着基督教的传播, 东斯拉夫有了来自于保加利亚的文字 (参见基里字母、格拉哥里字母)。出现了两种有近亲关系、但在发生学和功能上不同的标准语——

古斯拉夫语和古俄语，两者之间曾经相互影响。东斯拉夫诸语言的现代民族标准语形成于19—20世纪（参见**白俄罗斯语、俄语、乌克兰语**）。

最早的东斯拉夫语古文献产生于11世纪（用基里尔字母书写）。

Бернштейн С. Б., Очерк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ков. Введение. Фонетика, М., 1961.

Его же, Очерк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ков. Чередования. Именные основы, М., 1974.

Филин Ф. П.,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языка восточных славян, М.-Л., 1962.

Его ж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и бел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ов, Л., 1972.

Нахтигал Р., Славянские языки, пер. со словенского, М., 1963.

Вступ до порівняльно-історичного вивчення слов'янських мов, Київ, 1966.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и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и восточно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ков, М., 1980.

Булахов М. Г., Жовтобрюх М. А., Кодухов В. И., Восточнославянские языки, М., 1987.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俄语（Русский язык）

〔原作者：Ф. П. 费林（Ф. П. Филин）；译者：于鑫，天津外国语大学〕

东斯拉夫诸语言之一，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语言之一、原苏联各民族族际交往的工具、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之一。使用俄语的人口总数 2.5 亿，其中苏联有 1.84 亿（据 1979 年普查）。

14—15 世纪，俄语从解体的古俄语中独立出来，源自古俄语的还有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俄语有别于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之处是，它的系统的独特性质，主要是语音系统和形态系统。语音系统的特点是词根中的辅音之间有 ро, ло 和 ре, ле，而在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中则为 ры, лы 和 ри, ли（俄语 крошить, глотать, тревога, слеза, 乌克兰语 кришити, глитати, тривога, 白俄罗斯语 крышиць, глытаць），软齿音和唏音与 j 组合的发音在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中是长软辅音（如俄语 платье, судья, 乌克兰语 плаття, суддя, 白俄罗斯语 плацце, судзья），塞音或擦音 г 在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中为咽辅音 h（如俄语 город 或 уород, 乌克兰语 horod, 白俄罗斯语 horad），等等。形态系统的特点是没有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中存在的呼格（俄语 брат! ‘老弟!’，сын! ‘儿子!’，乌克兰语 брате!, сынку!, 白俄罗斯语 браце!）。名词变格形式中没有 к, г, х 与 ц, з, с 的交替，而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中有这样的交替（俄语 нога / на ноге, 乌克兰语 нога / на нозі, 白俄罗斯语 нага / на назе）。非中性名词广泛存在以重读-a(-я)为词尾的复数主格形式，而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则没有这种形式（俄语 дома́, учителя, 乌克兰语 дома, учителі, 白俄罗斯语 дамы́, учітелі）。在词汇这一最具动态性，受外部影响最大的语言层面上，俄语与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也有很大的区别。

俄语的各种方言和地方话可合并为两个方言区：北部大俄罗斯方言区（最典型的特点是 o 音化）和南部大俄罗斯方言区（不同类型的 a 音化区域），而北俄方言和南俄方言各种特点的独特组合则体现在俄罗斯中部的各种地方话中。16—17 世纪，在北俄方言区和南俄方言区交界地莫斯科，形成了吸收两者相同特点的共通语，并逐渐成为典范。在莫斯科罗斯，各种体裁的原创、翻译文学发展起来，但统一的标准语还没有形成。从古俄语时代继承下来的两种标准语——抄本教会斯拉夫语和以民间言语为基础的纯俄语标准语继续并存；两者之间还产生过各种不同的过渡类型。标准语的形成过程是充满矛盾的：从 14 世纪末开始，由于所谓“第二次南斯拉夫语影响”，许多作品语言的拟古之风越演越烈，出现了远离民间言语的“辞藻堆砌”文体；而与此同时，以大众语言为目标的各种体裁的平民文学也广泛传播开来。

从 17 世纪开始，大俄罗斯部族演变为拥有自己民族语言的俄罗斯民族。在民族语时代，标准语双语现象不复存在。在得到扶持的大众话基础上，形成了统一的标准语规范，方言分化停止了，标准语对地方话的影响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大，并逐渐将其排挤出言语领域。而在此前几个世纪里，对言语修养产生了重大作用的教会斯拉夫语，则只作为教会语言保存下来。纳入俄罗斯民族标准语的教会斯拉夫词语，已经不再被认为是非母语的（虽然是近亲语言）成分，开始在语体上中立化，或者被归入古词的总体类别中。收入 17 卷本《现代俄语标准语词典》（1948—1965）的教会斯拉夫词，占现代俄语标准语总词汇量的不到 10%。

18 世纪成为俄罗斯民族语言形成的转折阶段，这是一个蓬勃发展工业、致力改造国家、提升科学和文学的阶段，届时西欧语言（特别是法语）的影响开始显现。19 世纪初，不同的语言流派在普希金的创作中汇聚成一个统一的系统，这个系统的基础就是经过文学加工的俄罗斯民间言语。标准语出现两种相互联系的变体：书面语和口语。系统严谨的标准语规范得到清晰的表述，彼此关联的语体类型丰富了起来。俄语标准语成为多功能的交际手段，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可以表达人类积累的全部知识。19—20 世纪的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家，对丰富俄语标准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自 19 世纪下半叶起，除作家之外，对俄语标准语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还有许多社会活动家、科学和文化界的代表人物。

В. И. 列宁的著作语言对标准语（尤其是科学语体和政论语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17 年十月革命和此后的文化、科技革命，使俄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词汇（尤其是术语）系统明显得以更新，变得更加丰富，出现了一些新的语体手段，许多表达手段从语体的角度重新得到评估，标准语全面大众化的程度得到加强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在居民中推广标准语进展得很缓慢。而在苏维埃时代，通过实施全民义务教育、扫除文盲和使劳动群众广泛参与文化活动，标准语得到广泛普及。到 20 世纪下半叶，旧的地域方言原封不动被保留下来的情况几乎已经不存在了。绝大多数说地方话的人，或者说的已是改造了一半的方言（标准语规范和方言特点混合），或者改说几乎完全正确的标准语（掺杂方言残余）。方言就像非标准语的城市俗语那样，是随着群众言语修养提高而逐渐消失的一种现象。

除标准语、地方话（地域方言）、非标准语的俗语之外，俄罗斯民族语中还有各类职业、社会、年龄群体内使用的**习惯语**（试比较：航海业 компас ‘罗盘’，矿工群体 добыча ‘开采’，青年群体 железно ‘肯定’、предки ‘父母’以及过度频繁使用 нормально 以致词义泛化等）。特定社会、年龄群体习惯语的特点是，“时髦”用语更替迅速。

规范的标准语本身在语体方面是不同质的。它的主要部分（约 75% 的语言单位）是中性的，也就是说，在规范词典和规范语法中，这部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语言单位都没有任何评价标注。它们可用于各种交际形式，不带有低俗、书面语或其他评价标注。而与此同时，却还有另外一些词汇单位在词典中带有“口语”、“俗语”、“专业语”等语体标注，指出语言单位语体色彩的各种程度差别和使用领域。这些非中性单位中最常见的，是无拘束言语中的口语性成分。口语并不是一个特殊的语言系统，而是标准语的一部分，符合标准语的规范。“口语性”这一范畴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使规范的标准语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另一方面又是标准语的一种具有专门属性（比如：发音不充分，句际切分不清晰，常用省略方式、非常规词序、重复手段等）的口头变体。

俗语也具有双重性质，指的是那些描写思想中的客体时使用的略嫌粗鲁、低俗的语言表达手段。操标准语者在特定的言语场合也使用俗语，在这种情况下，俗语一方面表达出鲜明的修辞色彩，但另一方面又被排斥出标准语的范围之外。标准语掌握的程度较低、言语修养水平尚需提高的人，往往倾向于使用非标准语俗语。俗语的一个特点是或多或少地包括一些方言词语的成分。但俗语的使用并不受地域限制，可在俄语分布的整个区域使用。

专业术语，如医学 *коллапс* ‘虚脱’、法律 *презумпция* ‘无罪推定’等，在词汇系统中数量之多不可胜数，它们是补充标准语通用词的重要来源。

俄语从古罗斯继承了文字（参见**基里尔字母、格拉哥里字母**）。基里尔字母是现代俄语字母表的基础。现存最早的反映俄语成分的古文献产生于 11 世纪，其中有：奥斯特罗米尔福音书（1056—1057 年）、古代俄罗斯手抄文集（1073 年和 1076 年）、阿尔汉格尔福音书（1092 年）、诺夫哥罗德祈祷月书（1096—1097 年）等。

作为苏联各民族的族际交际手段，俄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超过 0.61 亿（1979 年普查数）的苏联非俄罗斯族人口流利地使用俄语。俄语和苏联各民族语言因长期接触而相得益彰。俄语服务于苏联各族人民，使他们得以了解苏联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就，了解世界文化。

从 20 世纪中叶起，俄语学习在全世界越来越广泛地推广开来。作为世界层级的语言（参见**国际语言**），俄语对于接触苏联科学技术成就和满足经济、科学、文化交流需求的重要作用，以及俄罗斯文学在世界范围的影响，这些都激发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俄语的兴趣，产生了掌握俄语的需要。现在有 100 多个国家（截止 1987 年 1 月 1 日数据）开展俄语教学。学生人数最多的是欧洲国家。1967 年成立了**世界俄语教师联合会**。1973 年创办了普希金俄语学院。关于俄语的研习情况参见**俄语学**。

Шахматов А. А., Очерк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4 изд., М., 1941.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XVII—XIX вв., 2 изд., М., 1938.

Его же,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о слове, 2 изд., М., 1972.

Винокур Г. 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М., 1945.

Обнорский С. П.,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старшего периода, М.-Л., 1946.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т. I—II, М., 1952.

Борковский В. И., Кузнецов П. С.,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2 изд., М., 1965.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т. 1—4, М., 1968.

Аванесов Р. И., Русск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М., 1972.

Русская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я, М., 1973.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1979.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 1—2, М., 1980.

Филин Ф. П., Истоки и судьбы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М., 1981.

Иванов В.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2 изд., М., 1983.

关于主要俄语词典参见**词典**词条。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乌克兰语（Украинский язык）

[原作者：Н. Н. 比陵斯基（Н. Н. Пилинский）；译者：徐英平，哈尔滨师范大学]

东斯拉夫诸语言之一，主要通用于乌克兰境内，也分布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与其毗邻的各州和库班、远东地区，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加拿大、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地。乌克兰境内的使用人口总数 4259 万。

乌克兰语各种方言可合并为三个方言区：东南方言区（第聂伯河中游地区的地方话）、斯罗博让地区的地方话和草原地方话）、西南方言区（沃伦—波多利斯克地区的地方话、加里西亚—布科维纳地区的地方话和喀尔巴阡地区的地方话）、北部方言区（左岸地区的地方话、右岸地区的地方话和沃伦—波利西耶地区的地方话）。现代乌克兰标准语的基础是东南方言区。

乌克兰语区别于其他斯拉夫语的特点主要如下。语音方面：词源音素 *o*、*e* 和 *i* 的交替；二合元音 *ѣ* 转为 *i*；*e* 前的软化丧失；辅音 *г* 属于咽擦音。形态方面：存在呼格；阳性名词

与格和前置格以-ові, -еві 为词尾; 形容词的形式有紧缩现象; 未完成体动词将来时形式是综合形式。句法方面有以-но, -то 结尾的不变化动词形式构成的无人称句等特点。词汇组成虽基本上源于古俄语, 但也有一系列纯乌克兰词, 如 гарний ‘美丽的, 好的’、мрія ‘理想’、плекаати ‘培育, 培养, 培植’、щоденний ‘每天的’、діяти ‘活动’、дія ‘行为’。

乌克兰标准语历经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 老乌克兰语阶段(14—18 世纪中叶)和现代乌克兰标准语阶段(18 世纪末起)。老乌克兰语用于法令和其他公文、政论文献、学术性散文及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

老乌克兰语的规范在 Л. 济扎尼 1596 年出版的语法、词典和 П. 别伦达 1627 年出版的《斯拉夫罗斯语词典》中也得到反映。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 И.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及其他作家的作品相继问世, 现代乌克兰标准语在乌克兰得以确立。在乌克兰标准语的历史中 Т.Г. 舍甫琴科的创作发挥了杰出的作用, 舍甫琴科奠定了建立在民间口语之上的乌克兰全民标准语的基础。乌克兰全民标准语是以第聂伯河沿岸方言为基础, 在老乌克兰标准语和具有近亲关系的俄语标准语影响下形成的。19 世纪下半叶, 由于 П. 米尔内、И. 涅楚伊-列维茨斯基、И. 弗兰科、М. 科秋宾斯基、Л. 乌克兰卡、Л. 格利博夫、П. 格拉博夫斯基等人开展的活动影响, 乌克兰所有的方言连同它们的地域变体, 最终被统一为乌克兰全民标准语。

1917 年十月革命后, 乌克兰标准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乌克兰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 乌克兰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为其政论语体、科学语体、公文事务语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保证。治理语言规范和诸多学科术语系统混乱状态的工作, 在 50 年代初宣告完成。从此, 开始了乌克兰标准语规范建设的新阶段。对文学语体和日常口语语体规范变体进行了区分, 进而对所有功能语体的语体规范进行了重新调整。但新规范变体的出现已经不能动摇乌克兰标准语的稳定性, 因为这些新的规范变体被理解为具有专门功用的变体。到 80 年代初, 上述所有变化均被在《乌克兰语词典》(第 1—11 卷, 1970—1980 年出版; 1983 年苏联国家奖)中确定了下来。

乌克兰语继承了古俄语的文字(参见**基里尔字母**)。现代乌克兰字母系统以俄语世俗字体为基础创制。最古老的文献有: 法律文件(14—15 世纪), 佩列索普尼茨福音书(1556—1561 年); М. 斯莫特里茨斯基的《天国的钥匙》(1587 年)、И. 维申斯基的《简述天主之诱惑》(1588 年)和 К. 斯塔夫罗韦茨基《神学的护心镜》(1618 年)等。

Житецкий П. И., Очерк звуковой истории малорус. наречия, К., 1876.

Шахматов О., Кримський А., Нарисиз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мови, Київ, 1924.

Булаховський Л. А., Питання походження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мови, Київ, 1956.

Гумецька Л. Л., Нарис словотворчої системи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актової мови XIV—XV ст., Київ, 1958.

Курс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літературної мови, т. 1—2, Київ, 1958—1961.

Жовтобрюх М. А., Кулик Б. М., Курс сучасної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літературної мови, ч. 1, 2 изд., Київ, 1961.

Горецький П. Й.,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лексикографії, Київ, 1963.

Сучасна українська літературна мова, за ред. І. К. Білодіда, т. 1—5, Київ, 1969—1973.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мови, т. 1—4, Київ, 1978—1983.

Українсько-російський словник, т. 1—6, Київ, 1953—1963.

Словник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мови, т. 1—11, Київ, 1970—1980.

Словник староукраїнської мови, т. 1—2, Київ, 1977—1978.

Етимологічний словник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мови у семи томах, т. 1—2, Київ, 1983—1985(изд.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Рус.-укр. словарь, 3 изд., т. 1—3, К., 1987—88.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白俄罗斯语 (Белорусский язык)

[作者: M. P. 苏德尼克 (M. P. Судник); 译者: 赵蓉晖,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东斯拉夫诸语言之一, 分布于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与其毗邻的各州, 还有哈萨克、爱沙尼亚、波兰、加拿大、美国、阿根廷。境内使用人口总数超过 795 万。

白俄罗斯语起源于古俄语, 首先是德雷戈维奇、拉季米奇和西克里维奇人使用的地方话, 这些部族曾居住在普里皮亚季和西德维纳之间的疆域, 以及第聂伯河上游及索日河沿岸。现代白俄罗斯语各地的地方话构成两个主要方言: 东北方言, 包括波罗茨克地方话组和维捷布斯克—莫吉廖夫地方话组, 它们的特点是异化的 а 音化 (вѣда́, ады́, вад'э́ 类型的发音) 与异化的 я 音化 (н'асу́, н'ас'и, 但 н'исла́ 类型的发音) 现象; 西北方言, 包括格罗德诺—巴兰诺维奇地方话组和斯鲁茨克—莫泽尔地方话组), 其特点是非异化的 а 音化 (вада́, вады́, вад'э́ 类型的发音) 与非异化的 я 音化 (я 音化不取决于重读元音的音质) 现象。此外还有一些过渡方言, 或称中部白俄罗斯地区的地方话, 还可特别区分出一组被称为波列斯的地方话, 它们的很多语音和语法特点与乌克兰语的北部方言区相似。白俄罗斯标准语的基础是中部白俄罗斯地区的地方话, 其中兼有东北方言与西南方言中与之相邻地区地方话的各别特点。

白俄罗斯标准语较之近亲的诸东斯拉夫语有一些不同的特点。语音方面: 在起源上本为 в 和 л 的位置上使用非成音节音素 у (праўда, воўк); 有前增音现象, 如在唇元音前的 в (вока, вуха), 在辅音组合前的 а, і (аржаны, імгла); ро, ло, ле 音组 (其中 о, е 来自弱化的 ъ, ь) 和处于辅音之间的 ры, лы, лі 发生交替 (кроў/кыві, глётка/глытаць, бляск/блішчаць); 在老的紧元音 ъ, ь 位置上使用 ы, і (злы́, малады́, худы́; бі, пі, лі; мый, ры́й, шый); 软辅音 д', т' 塞擦音化为 дз, ц (тс) (дзень, дзіва, цень, ціхі)。

形态方面的特点: 数词 два, дзве, абодва, абедзвеу 的变格系统有不同的性范畴形式 (двух, дзвух, абодвух, абедзвух 等); 形容词、形动词和顺序数词阳性主格形式末端的 й 脱落 (试与俄语比较: цудоўны — чудесный, летні — летний, прачытаны — прочитанный, трэці — третий); 被动形动词现在时形式不常用, 主动形动词现在时形式限制在术语场合使用 (вядучае кола '主动轮'); 代词第三人称变格时不出现 н 的成分 (试与俄语比较: пра яг — 'про него', без яе — 'без нее', аб іх — 'о них')。句法方面: 描写性结构较之形动词短语更常被选用; 和宾格名词搭配的前置词 паўз 表示 '沿着' '在旁边' (праезджалі паўз раку '沿着河 (在河旁边) 驶过'); 使用前置词 па 与复数前置格形式搭配 (па гарадах і сёлах '走遍城市和乡村'); 有“动词 + 与格宾语”的结构 [дзякаваць, дараваць, прабачыць (каму) '感谢、请求、原谅 (某人)']; 在使用 смяяцца '笑话', здэкавацца '挖苦', кпіць '讥笑' 等动词的结构中, 宾语用前置词 з 支配的属格形式表示 (смяяцца з таварыша '笑话同志'); 词汇系统方面: 除源于古俄语的词汇之外, 还使用一系列白俄罗斯语的特有词汇, 如 ветразь '帆'、гарэза '淘气鬼'、апошні '最后的'、сціплы '谦虚的'、грувасціць '堆积'、кеміць '领悟'、пакрысе '不多地'、шмат '多' 等。

白俄罗斯标准语的发展历经了两个主要时期: 老的白俄罗斯书面标准语时期 (14 世纪—18 世纪中叶) 和现代白俄罗斯标准语时期 (自 18 世纪末起至今)。前一时期以翻译的宗教文献、法律文件和公文文档等古文献, 编年史和地方志等为代表; 现代白俄罗斯标准语时期是在鲜活的民间语的基础上形成的, Я. 库巴拉和 Я. 科拉斯的创作在标准语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现代白俄罗斯语的文字以基里尔字母 (世俗字体) 为基础; 16—19 世纪以及稍后的时期里, 还曾使用过拉丁字母的波兰变体和阿拉伯文字形式, 白俄罗斯当地的鞑靼人用这种文字形式转写的白俄罗斯语文本以所谓阿里-吉塔布、哈马伊尔、杰夫西尔等抄本类型保存了下来。白俄罗斯语的最早文字记载是波洛茨克里加条约 (1330 年)、立陶宛亚历山大·维托

夫特·凯斯图基耶维奇大公钦赐瓦西里·卡拉乔夫斯基特权诏书（1386年）、卡兹米尔·亚杰隆奇克国王法典（1468年）等。15—16世纪白俄罗斯语文字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期间问世的有：西俄罗斯诵读书（1489年）、圣经旧约诗篇、圣经Ф. 思科里纳译本（1517—1519年）、立陶宛大公国法典（1529, 1566, 1588年）、巴尔加拉波夫编年史（16世纪末）等。

Карский Е. Ф., Белорусы, 2 изд., в. 1—3, 1955—1956.

Дыялекталагічны атлас беларускай мовы, ч. 1—2, Мінск, 1963.

Граматыка беларускай мовы, т. 1—2, Мінск, 1962—1966.

Бурилло Н. В., Булахов М. Г., Судник М. Р., Беларус. язык, в кн.: Язык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т. 1, М., 1966 (лит.).

Бірыла М. В., Беларуская антрапанімія, ч. 1—3, Мінск, 1966—1982.

Гісторыя беларускай літаратурнай мовы, т. 1—2, Мінск 1967—1968.

Булыка А. М., Жураўскі А. І., Крамко І. І., Гістарычная марфалогія беларуска мовы, Мінск, 1979.

Носович И. И., Словарь белорус. наречия, СПб, 1870.

Беларуска-рускі слоўнік, М., 1962.

Тлумачальны слоўнік беларускай мовы, т. 1—5 (кн. 1—6), Мінск, 1977—1984.

Слоўнік беларускіх гаворак Паўночна-Заходняй Беларусі і яе пагранічча, т. 1—5, Мінск, 1979—1986.

Гістарычны слоўнік беларускай мовы, т. 1—8, Мінск, 1982—1987.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亚美尼亚语（Армянский язык）

[原作者：Э. Г. 图马尼扬（Э. Г. Туманян）；译者：张志军，哈尔滨师范大学]

印欧诸语言之一，是其中的一个特殊语族。分布于亚美尼亚，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及其他很多国家（叙利亚、黎巴嫩、美国、伊朗、法国等）也有人使用。国内使用人口总 298 万多。大多数研究者推测，亚美尼亚语的基础是乌拉尔图国海阿斯—亚美尼亚部落联盟的语言。亚美尼亚民族共同体形成于公元前 7 世纪的亚美尼亚高原。

亚美尼亚书面标准语的历史可分为 3 个时期。5 世纪初创建了亚美尼亚字母系统，古亚美尼亚语因而为人所知。古亚美尼亚书面标准语形式被称作“格拉巴尔”（*гրաբар*）（5 世纪上半叶有若干古典形式）。近 11 世纪时，口头形式的古亚美尼亚语已不再使用。而格拉巴尔这一书面标准语形式则几乎使用到 19 世纪末，与新的标准语形成并存竞争的局面，后作为祭祀语言保存下来。在结构类型学方面，古亚美尼亚语主要属屈折—综合语，在动词系统中也有一些分析性构式。从印欧语的形态系统中保存下来的有指示代词的三元系统、动词和名词词干的若干构成原则、各别的格词尾和动词词尾、构词后缀等。语音系统就基本特征而言源自印欧语，但发生了一些变异：元音系统中的长短对立消失；印欧语的音节响辅音转化为元音，非音节响辅音转化为辅音；出现了一些新的擦音音位和印欧诸语言中没有的塞擦音系统；塞音系统发生断裂（和日耳曼诸语言中的辅音演变类似），改由明确的浊音列，清音列和送气音列体现。古亚美尼亚语的方言区分不明显。

中古亚美尼亚语阶段从 12 世纪持续到 16 世纪。这一时期现代亚美尼亚的各种方言开始形成。中古亚美尼亚标准语的特点是：辅音系统发生一系列变化（浊辅音的清化和清辅音的浊化）、二合元音单元音化、复数使用新的标记。在支配关系和词汇系统等方面也有所改变。中古亚美尼亚标准语体现在不同体裁的古文献中。

新亚美尼亚标准语自 17 世纪形成，体现为西亚美尼亚语和东亚美尼亚语两种变体。西亚美尼亚语变体以君士坦丁堡方言为基础；东亚美尼亚语变体依托亚拉腊方言。东部变体是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上亚美尼亚的东部地区）原住居民和部分居住在伊朗的亚美尼亚人使用的语言。标准语东部变体行使多重功能，是科学、文化领域，各级学校和

大众交际使用的语言，用这种语言撰写了丰富的文献。标准语的西部变体通行于黎巴嫩、叙利亚、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亚美尼亚族群中，他们来自历史上的亚美尼亚西部地区（现代土耳其境内）。用亚美尼亚语西部变体出版各种体裁的著作，在各种亚美尼亚学校（威尼斯、塞浦路斯、贝鲁特等地）授课。但在一些领域，尤其在自然、技术科学领域使用有限，这些领域授课要使用相应地方的主体语言进行。苏维埃时期，亚美尼亚也出版用标准语西部变体撰写的著作。

新亚美尼亚标准语的变体差别在所有层级上都表现出来，尤其是在语音层级上（主要在辅音系统方面）。标准语东部变体在语音方面比西部变体更加接近格拉巴尔书面标准语，但统一的书写法和拼写法使两种变体的使用者都能够相互理解对方的文本。两个变体的不同还表现在某些格形式和动词词形变化聚合体的构成（东部变体分析性构式使用得更广泛）、冠词和前置词的使用等方面。词汇方面的差异则持续地扩大。

新亚美尼亚标准语东部变体有 6 个元音音位和 30 个辅音音位，其中包括根据清、浊和送气特征加以区分的 9 个塞音音位、6 个塞擦音音位、两个鼻音音位和一个擦音音位系列。词区分为以下类别：名词、形容词、动词、代词、数词、副词、前置词和后置词、连接词、情态词和感叹词。名词有两种数（单数和复数），复数基于黏着原则构成；无性范畴；有 7 个格（按其他分类法为 5 个）和 8 种变格法。形容词不与名词保持一致联系。数词体现计数的十进制系统，源于印欧语的词根。印欧语代词的类别几乎全部保存了下来。动词有 3 个态范畴（主动态、被动态和中动态），3 个人称范畴，两个数范畴，5 个式范畴（陈述式、命令式、愿望式、条件式、祈使式），3 个时间范畴（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3 个所谓动作体范畴（进行体、完成体和应该完成体）。时间形式通常分为简单形式和分析形式，后者又分主要合成形式和次要合成形式。以分析形式为主。时间形式和式形式由现在时和一般过去时两种词干构成。动词有两种变位法，按结构可以区分为简单变位法和后缀变位法。名词的形式由各种形动词来表达。

句子中词之间的句法联系由一致联系、支配联系表示，部分通过词序表示。定语前置并且不与被限定语保持一致联系。句子为主格结构。词序自由，但通常居于首位的是主语短语，然后是谓语短语；状语置谓语后。句子常是简单句（扩展句和非扩展句）和具有并列联系、主从联系的复合句。

现代亚美尼亚语有众多的方言，彼此差别很大，与标准语也相去甚远。这些方言根据不同的原则进行分类，其数量也因此按不同的方式加以确定。P.A. 阿恰良根据形态规则（按现在时的构成特征）将方言分为 3 支，涵盖 36 种方言；A.C. 加里比扬则将语音特征也考虑在内，认为可分 7 支（51 种方言）。多特征分类法（Г.Б. 贾乌基扬）选择 100 条特征作为衡量标准，将方言分为 11 个组，包括 44 种方言。方言间的相互区别通常表现在语音、形态和词汇层面上。目前出现方言特征加速磨灭的进程，频繁的迁徙现象和都市化等因素造成了一系列方言的消亡。

首批用亚美尼亚语书写的古文献产生于 5 世纪初（参见**亚美尼亚文字**）。

Абебян М., Теория армянского языка, Ер., 1931; 2 изд., Ер., 1965 (на арм. яз.).

Гарибян А., Армянская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я, Ер., 1953 (на арм. яз.).

Капанцян Г. А., История армянского языка, Ер., 1961 (на арм. яз.).

Кусикьян И. К., Изменения в словарном состав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армян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М., 1964.

Туманян Э. Г., Армянский язык, в кн.: Язык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т. 1, М., 1966.

Её же, Армянский язык, в кн.: Совет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за 50 лет, М., 1967.

Её же, Древнеармянский язык, М., 1971.

Её же, Структура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имён в армянском языке, М., 1978.

Абрамян С. Г., Парнасян Н. А., Оганян А. 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армянский язык, т. 2, Морфология, Ер., 1974 (на арм. яз.).

Абрамян С. Г.,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армянский язык, т. 3, Синтаксис, Ер., 1976 (на арм. яз.).

Джаукян Г. Б., Общее и армян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Ер., 1978.

Аракелян В. Д., Хачатрян А. А., Элоян С. 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армянский язык, т. 1, Фонетика и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Ер., 1979 (на арм. яз.).

Hübschmann H., Über die Stellung des Armenischen im Kreis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KZ 23, 1875.

Meillet A., Esquisse d'une grammaire comparée de l'arménien classique, Vienne, 1903; 2 éd., Vienne, 1936.

Solta G., Die Stellung des Armenischen im Kreis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W., 1960.

Godel 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lassical Armenian, Wiesbaden, 1975.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menian Linguistics (USA, 1979), Leuven, 1980.

Ачарян Р. [Աճարյան Ր.],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коренной словарь армянского языка [Հայերենի արմատական բառարան], т. 1—4, Ер., 1971—1979 (на арм. яз.).

Русско-армян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 1—4, Ер., 1954—1958.

Агаян Э.Б. [Աղայան Է. Բ.],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армянского языка [Արդի հայերենի բացատրական բառարան], т. 1—2, Ер., 1976 (на арм. яз.).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塔吉克语 (Таджикский язык)

[原作者: А. А. 克利莫娃 (А. А. Керимова); 译者: 徐来娣, 南京大学]

伊朗诸语言之一 (属西南语支), 通用于苏联 (塔吉克、乌兹别克以及吉尔吉斯和哈萨克的部分地区), 还分布于阿富汗北部和伊朗部分地区, 使用人口总数约7200万, 其中在前苏联超过2800万。可区分为以下几个方言组: 北部方言组 (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费尔干纳盆地、乌拉—秋别、彭吉肯特等地的各种地方话)、中央 (上泽拉夫尚) 方言组、南部方言组 (卡拉特金、库利亚布、罗格和巴达赫尚等地的一些地方话)、东南 (达尔瓦扎) 方言组。

语音系统包括6个元音和24个辅音。语法系统属曲折—分析型。名词性 (именные части речи) 词类已经失去了古代发达的词形变化系统。没有性和格的范畴。格的关系通过句法手段表示。名词性词类间普遍的联系手段是**被领属语附加成分** (изафет)。动词有很多分析性的形式和组合, 时间意义和体的意义紧密交织在一起, 可区分为陈述式、命令式、虚拟式、推测式。在一种特殊式 (不可见式, 或称听觉式) 的层面上还区分出完成时的若干形式。

塔吉克标准语源自古典波斯—塔吉克语 (9—15 世纪), 古典波斯—塔吉克语是波斯、塔吉克和阿富汗的达里语使用者的共同语源。苏维埃时期, 塔吉克标准语在和口语接近的过程中, 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用阿拉伯文字形式书写的首批书面古文献产生于9世纪。在苏联时代, 现代塔吉克语的文字以俄语文字形式为基础。

Расторгуева В. С., Опыт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таджикских говоров, М., 1964.

Керимова А. А., Таджикский язык, в кн.: Язык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т. 1, М., 1966 (лит.).

Фарханги забони тоҷикӣ, т. 1—2, М., 1969.

Забони адабии ҳозираи тоҷик. Синтаксис, Душ., 1970.

Забони адабии ҳозираи тоҷик.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фонетика ва морфология, Душ., 1973.

Ефимов В. А., Расторгуева В. С., Шарова Е. Н., Персидский, таджикский, дари, в кн.: Основы иран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Новоиранские языки, М., 1982.

Грамматикаи забони адабии ҳозираи тоҷик, ҷ. 1—2, Душ., 1985—1986.

Lazard G., Caractères distinctifs de la langue tadjik,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1956, t. 52, fasc. 1.

Русско-таджик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 [Душанбе], 1949.

Таджик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го очерка, сост. В. С. Расторгуевой), М., 1954.

Русско-таджик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85.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波罗的诸语言 (Балтийские языки)

[原作者: В. Н. 托波罗夫 (В. Н. Топоров); 译者: 赵蓉晖,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印欧诸语言的一个语族。较之印欧语系的其他现代语族,波罗的诸语言更加完整地保留了古印欧语的语言系统。有观点认为,波罗的诸语言是其他印欧语从该语系分离出去之后的古印欧语言的残留。在古印欧语的各种方言里,波罗的诸语言接近于东部的那些语言(印度—伊朗诸语言、斯拉夫诸语言等),即“S类”语言(在这些语言中,印欧语的后舌腭音是以啞音体现的)。与此同时,波罗的诸语言也具有所谓中欧诸语言所特有一些现象。因此可以说,波罗的诸语言在古印欧语诸多方言组成的连续统(континуум)中处于中间(过渡)地位(明显可以看到的是,波罗的诸语言恰好位于S类语言中“啞音化”完整程度最小的那个区位)。波罗的诸语言和斯拉夫诸语言特别接近(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说具有历时相似性或甚至等同性),人们对此的解释各不相同:一说是因为它们属于同一组印欧语的方言,处于近邻的位置,经历了一系列共同变化的过程,而这些过程是印欧语发展趋势的继续;一说是因为在相对晚近时期操这些语言的人居住地域接近起来,这使得他们的语言发生汇聚,结果产生了许多共同成分;一说是因为曾经存在一种波罗的一斯拉夫共同原始语(这是一种最普遍的观点)。最后一种观点认为,斯拉夫诸语言自古就属于波罗的语族,前者在较晚时期才从后者中分离出来(在波罗的语区南部边缘)。根据这一观点,波罗的诸语言是斯拉夫诸语言的祖先,前者与其后裔共存于同一时空。紧密的发生学联系也把波罗的诸语言与巴尔干地区的那些古印欧语言(伊利里亚语、色雷斯语和其他语言)结合在了一起。

现代波罗的诸语言的分布区域限于波罗的海东部沿岸(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东北部的苏瓦乌基、白俄罗斯部分地区)。在较早一些时期,波罗的诸语言也曾波罗的海南岸通行(东部沿海东普鲁士境内),直到18世纪初,那里还保留着普鲁士语的残余,而再往东去,似曾还有雅特维亚格语残存。根据地名(特别是水体名称)资料、斯拉夫语言中的波罗的词语、考古和历史事实等各方面的信息判断,公元第一个千年至第二个千年初叶,波罗的诸语言曾分布于波罗的海沿岸以南及东南的广大地区,包括上第聂伯河沿岸,一直到伏尔加河上游右侧各支流流域、上奥卡河及中奥卡河沿岸地区(包括莫斯科河流域西部及现代莫斯科城市北部)、谢伊姆河流域东南部与普里皮亚季河流域南部(尽管在普里皮亚季河流域以南的其他地区也发现了毫无争议的波罗的词语)。可以说,波罗的语成分也存在于维斯拉河以西的地区(波莫瑞和梅克伦堡),尽管这些波罗的语词的来源并不总是很清楚。有一组地名同言线把波罗的海地区与潘诺尼亚、巴尔干地区及亚得里亚海沿岸连结起来。波罗的诸语言古代的分布区域特点,可以用来说明波罗的人和芬兰—乌戈尔、伊朗、色雷斯、伊利里亚、日耳曼等族群的语言接触足迹。

现代波罗的诸语言是立陶宛语和拉脱维亚语(有时还单独列出拉特加尔语)。已经消亡的波罗的语言有:普鲁士语(东普鲁士),使用该语言的人后来失去自己的语言而改用德语;雅特维亚吉语(波兰东北部、立陶宛南部、毗连的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地区等;该语言的残存18世纪前似尚存在),其遗迹至今仍然保留在上述地区的立陶宛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的言语中;库尔什语(今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境内波罗的海沿岸)消失于近17世纪中

叶，其残留痕迹见于拉脱维亚语以及立陶宛语、利夫语的一些地方话中（不应把库尔什人的语言和所谓的库尔塞尼亚人（Kursenieku valoda）的语言，亦即库尔什沙嘴约德克兰德村所说的拉脱维亚地方话混淆起来）；**塞龙语**（或称塞利语），根据 13—15 世纪的文献，曾在拉脱维亚东部、立陶宛东北部一些地区使用；**加林德语**（或称戈利亚德语；南普鲁士，莫斯科附近的普罗特瓦河流域或也曾使用），只能根据有限的关于加林德（14 世纪文献）和普罗特瓦河流域的地名材料判断（参照罗斯编年史中对“戈利亚德人”的记载）。还有的在东斯拉夫疆域居住的波罗的人的语言（一种或若干种），人们对其名称无从知晓。但是显然，亚特维亚吉人（他们就是苏达维亚人，试比较作为普鲁士领土组成部分的苏达维亚）和加林德人（郭林德人的语言与普鲁士语相近，它们可能是后者的方言，都可以和普鲁士语一起归入西部波罗的诸语言，与立陶宛语和拉脱维亚语（属东部波罗的诸语言）有所区别。更确切一些似可以说，它们是波罗的语分布区外围的一条腰带状地区的语言（普鲁士语在最西部，加林德语和雅特维亚吉语在最南部，也可能还在东部），与处于“内部”地带联系相对紧密的核心语言（立陶宛语和拉脱维亚语）形成对立关系。在这一“内部”地带里，那些“跨语言”联结线（如下立陶宛方言和下拉脱维亚方言联结线以及相应的上立陶宛方言和上拉脱维亚方言联结线）有重要意义。处于外围地带的波罗的诸语言早期已被斯拉夫化，整体成为波兰语和东斯拉夫语的底层语组成部分，完全融合在这些语言中。值得注意的是，最早知道这些波罗的语言和相应部族的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作家（试比较：公元 98 年 P. C. 塔西佗关于“埃斯基人”（波罗的人）的记载；公元 2 世纪 K. 托勒密对波罗的海南部沿岸的居民“加林德人”和“苏金人”的记载）。1845 年 G. H. F. 内塞尔曼开始把波罗的海沿岸的印欧语言统称为波罗的诸语言。

波罗的诸语言的音系结构拥有一系列共同特征，几乎由同样的音位组成（立陶宛语的音位数量略多于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似应还包括普鲁士语）的音位系统可用同一套区别特征加以描写：重要的有腭音音位与非腭音音位的对立（k': k; g': g; n': n 类，立陶宛语中这类对立的数量远多于拉脱维亚语）、简单辅音音位和塞擦音音位（c, ʒ, č, ʒ）以及紧音音位和非紧音音位（e : æ, i : ie, u : o）的对立，音位 f, x（立陶宛语中甚至还有 c 和 dz 或拉脱维亚语中的 dz）则处于边缘地位，通常出现在借词中。波罗的诸语言在韵律层面的相似也很重要，但立陶宛语的重音是自由的，而拉脱维亚语的重音则固定在起始音节上（芬兰语的影响）。元音音位有长短的区分（试比较：拉脱维亚语 *vīrs* ‘…之上’ / *vīrs* ‘丈夫’或者立陶宛语 *butas* ‘住宅’ / *būtas* ‘过去的’）。音调对立也是立陶宛语和拉脱维亚语的特点，虽然在具体情况下对立实现的方式有所区别（试比较：拉脱维亚语 *plāns* ‘泥土地面’（长调） / *plāns* ‘薄的’（锐音调）、*laūks* ‘田野’（长调） / *lāuks* ‘白脑门儿的’（降调）；立陶宛语 *áušti* ‘变凉’（降调） / *aūšti* ‘变亮’（升调））。波罗的诸语言的音位分布规则相对一致，特别对词首位而言（允许不超过 3 个辅音音位连缀，试比较：*str-*, *spr-*, *spl-*, *skl-*等）；词末位的辅音音位分布复杂一些，因为在一些词法形式中会丧失词末尾的元音音位。音节既可能是开音节，也可能是闭音节；作为音节中心的元音音位可由任何一个元音音位或二合元音音位（*ai*, *au*, *ei*, *ie*, *ui*）充当。

动词的形态音位特点是元音音位有量和质的交替现象，名词的形态音位特点是重音移动、音调互易等。词的最大（形态）构成极限可用下列模式来表示：“否定 + 前缀 + …… + 词根 + …… + 后缀 + …… + 词尾”。其中的前缀、词根和后缀可以出现一次以上（有时还会有复杂的词尾，如在代形容词中，试比较：拉脱维亚语的 *balt-aj-ai* ‘白色的’）。最典型的“重叠”现象有：体范畴前缀 + “词汇”前缀；复合词中“词根 + 词根”（通常为两个词根，但词根与词根的组成有多种不同情况，例如 *Adj. + Adj./Subst.*, *Subst. + Subst./Vb.*, *Pronom + Subst./Adj.*, *Numer + Subst./Numer.*, *Vb + Subst./Vb.*, *Adv. + Subst./Adj. /Adv.*），后缀+后缀（最常见的排列顺序是“客观评价后缀+主观评价后缀”）。波罗的诸语言拥有异

常丰富的后缀（尤其是表达指小/指大、表爱/表卑评价的后缀）。

波罗的诸语言名词形态范畴的结构特点是性范畴（阳性和阴性，带有中性的痕迹，尤其在一种普鲁士语的已知方言中）、数范畴（单数/复数，已知一些双数例证）、格范畴（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工具格、方位格以及上述所有各格对立的特殊呼格形式；立陶宛语的方言中有向格、入格、近处格，这可以底层芬兰语的影响加以解释）、叠加/非叠加范畴（首先体现在形容词的长尾和短尾形式上，但有时也体现在其他词的类别中）、级差范畴（形容词中有 3 个比较等级）。名词的变格系统按照以 -o-, -a-, -i-, -u- 和辅音结尾的词干区分为 5 类。与名词变格类型并列的还有代词的变格类型，它们对于形容词的格形式构成起着特殊的作用。动词除性范畴之外，重要的还有人称（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时间（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式（陈述式、条件式、愿望式、祈使式；拉脱维亚语有应该式和转述式，这明显是受了底层芬兰语的影响）和态范畴（主动态、反身态、被动态）。而将体范畴（包扩行为进行过程的开始、终结和重复等各种细微差别）及其因果/非因果差异看作构词事实则更加适宜。动词的形态范畴聚合体以结构简单为特点，这是动词第三人称形式数范畴对立发生中和造成的（有些方言，如塔姆方言中，人称范畴的对立也发生中和），它们有时可能以零词尾表示，而且陈述式动词的各种人称形式专门有一套（原则上）统一的词尾系统来体现。辅助动词各种人称形式与各种形动词的不同组合产生各种各样的时与式的复合类型。

在波罗的诸语言中，句子各成分间的句法联系通过词变形式、非独立词和依附手段来表示。句子的核心是：名词主格 + 动词的人称形式。两个成分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空缺（例如没有动词产生名词句）或者扩展（如名词短语可扩展成“形容词 + 名词”、“名词 + 名词”或者“前置词 + 名词/代词”；动词短语可扩展成“动词 + 副词”、“人称动词 + 人称动词”等），这些扩展规则可以使用一次以上。扩展规则的体现是相互关联的，特别与句中的词序关联。如动词短语通常跟在主格名词短语之后；在非系词人称动词短语中，旁格名词短语跟在非系词人称动词短语之后；在名词短语之内，如果若干格形式和属格名词相关联，它们应跟在属格名词之后（这个规则体现的概率很高，也极其重要，因为属格在波罗的诸语言中能够表达极其多样的句法关系，几乎是除主格之外的所有句法关系；属格在各种句法转换过程中独一无二的作用由此而来）。

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也包括普鲁士语）的绝大部分语义领域都被源于印欧语的固有词所包揽。这就允许我们在许许多多情况下都可以说，波罗的诸语言拥有一个几乎统一的词汇系统。在构词成分、虚词、代词性成分、主要语义领域（数词和亲属、身体部位、动植物、景色、天体、基本动作等的名称）中可以见到许多特别完整的对应单位。这方面的分歧只是例外现象（试比较：立陶宛语 *sūnus* ‘儿子’，普鲁士语 *soūns*，但拉脱维亚语 *dēls*；或者立陶宛语 *duktė* ‘女儿’，普鲁士语 *duckti*，但拉脱维亚语 *meita*；立陶宛语 *duona* ‘面包’，拉脱维亚语 *maize*，普鲁士语 *geits*；立陶宛语 *akmuo* ‘石头’，拉脱维亚语 *akmens*，但普鲁士语 *stabis* 等）。波罗的诸语言和斯拉夫语言的词汇共性非常大，这是由于两组语言拥有共同的来源和同样古旧色彩的缘故，当然还由于波罗的诸语言中的斯拉夫借词词层的缘故（社会—经济术语、宗教性质术语、日常生活和职业词汇等）。不少日耳曼词渗入立陶宛语，特别是拉脱维亚语中（拉脱维亚语中芬兰—乌戈尔语借词很多，在各种方言中更常见）。许多国际词纳入波罗的诸语言的方式不仅仅是直接借自来源语，而且还通过俄语、波兰语或德语的中介渠道。

关于波罗的诸语言的研究历史，参见**波罗的学**。

Топоров В. Н., Балтийские языки, в кн.: Язык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т. 1, М., 1966.

Augstkalns A., Mūsu valoda, viņas vēsture un pētījāji, Rīga, 1934.

Ozols A., Tautas dziesmu literatūras bibliogrāfija, Rīga, 1938.

- Ego že, Veclatviešu rakstu valoda, Rīga, 1965.
- Niedre J., Latviešu folklorā, Rīga, 1948.
- Endzelīns J., Baltu valodu skaņas un formas, Rīga, 1948.
- Ego že, Darbu izlase, t. 1—4, Rīga, 1971—1985.
- Fraenkel E., Die baltischen Sprachen. Ihre Beziehungen zu einander und zu den indogermanischen Schwesteridiomen als Einführung in die balt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Hdlb., 1950.
- Grabis R., Pārskats par 17. gadsimta latviešu valodas gramatikām, в кн.: Valodas un literatūras Institūta Raksti, V, Rīga, 1955, с. 205—66.
- Būga K., Rinkiniai raštai, I—III, Vilnius, 1958—1962 (особый том — указатели).
- Grīšle R., 17. gadsimta gramatikas kā latviešu valodas vēstures avots, там же, VII, 1958, с. 245—255.
- Zemzare D., Latviešu vārdnīcas (līdz 1900 gadam), Rīga, 1961.
- Stang Chr. S., 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baltischen Sprachen, Oslo — Bergen — Tromsø, 1966.
- Schmalstieg W. R., Studies in Old Prussia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Sabalaiuskas A., Lietuvių kalbos tyrinėjimo istorija iki 1940 m., Vilnius, 1979.
- Ego že, Lietuvių kalbos tyrinėjimo istorija, 1940—1980, Vilnius, 1982.
- Gineitis L., Lietuvių literatūros istoriografija, Vilnius, 1982.
- Kabelka J., Baltų filologijos įvadas, Vilnius, 1982.
- Jonynas A., Lietuvių folkloristika, Vilnius, 1983.
- Sabalaiuskas A., Baltų kalbų tyrinėjimai 1945—1985, Vilnius, 1986.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立陶宛语 (ЛИТОВСКИЙ ЯЗЫК)

[原作者: Т. В. 布雷金娜 (Т. В. Бульгина); 译者: 林春泽, 黑龙江大学]

波罗的诸语言之一, 通用于立陶宛, 使用人口约 280 万, 国外 (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等) 的使用人数超过 40 万。

有两种主要方言, 即热迈特方言和奥克什泰特方言。立陶宛语较之其他印欧活语言更好地保留了古代的语音和形态特点, 与近亲拉脱维亚语的区别在于 (整体上) 有更多的古旧色彩和某些新的语言现象。立陶宛语保留了: 古音素 k', g', 对应于拉脱维亚语的塞擦音 (akys ‘眼睛’, gerti ‘喝’, 试比较拉脱维亚语 acis, dzert); 词首音组 pj, bj (piauti ‘握’, 试比较拉脱维亚语 pjaut); 同音节音组 an, en, in, un (ranka ‘手臂’, penktas ‘第五’, minti ‘揉’, jungas ‘枷锁’, 试比较拉脱维亚语 roka, piektas, mlt, jugs)。与同音节音组关联的是立陶宛语动词变位形式中保存着拉脱维亚语已经消失的鼻音中缀, 如 krintu ‘(我) 跌倒’ / 过去时 kritau, juntu ‘(我) 感觉’ / 过去时 jutau, 试比较拉脱维亚语 křitu / křitu, jřtu / jřtu。

立陶宛语是带有黏着成分和分析成分的屈折语 (溶合语)。名词区分为两种一致关系类别 (中性形式已经消失)。某些代词以及形容词、分词中还保存着性范畴的 3 种形式。数范畴由单数和复数二元 (某些方言还保留着双数) 对立的形式列构成。格范畴聚合体包括 6 个格形式和一个特殊的呼格形式。有定/无定范畴在形容词 (和分词) 中有形态表达方式; 形容词 (和分词) 有简单的 (不可分解的, 非代词性的) 和复杂的 (可分解的, 代词性的) 两种不同形式。

动词的特点是可以构成丰富的分词, 这些分词在句法上被广泛使用。动词的时、态、式、人称范畴特殊: 人称词尾同时表达数的意义, 第三人称变位形式不具有区别数的功能; 分 4 种简单 (综合) 语法时形式 (现在时、一次过去时、多次过去时和将来时); 动词 buti ‘是, 有, 在’ 与分词 (各种时和态的形式) 组合构成复合 (分析) 时系统; 被动态借助被动分词

构成,分析型被动式不仅与带主动分词的相应复合形式相对立,而且与始终用于主动态的简单(综合)人称形式对立;式范畴系统区分为陈述式、假定式、命令式和“间接式”(最后一种式未获共识),间接式(可与拉脱维亚语的“转述”式相比较)通过主动态分词充当谓词来表示。立陶宛语没有体这一斯拉夫语的语法范畴类型,各种体貌意义的表达与动词的词汇意义、构词意义关联,也与动词的具体时间形式相关。动词的基本体貌语义将它们区分为两类:过程动词和事件动词(eigos veikslas 和 ivykio veikslas, 将这两个术语译成俄语的“未完成体”和“完成体”会引起误解)。其他语义—构词类别的划分涉及及物性、反身性等方面的差别。立陶宛语的一个特点是,在及物动词中除了支配受事的典型使役动词外,还存在一类所谓 куратив 的特殊动词,它们语法上支配的宾语在语义上是动词行为的施事。

立陶宛语属于主格结构语言,简单句的普遍语序是 SVO, 尽管也可能有变异出现,尤其是和实际切分相关的变异。立陶宛语广泛使用主谓句式“我(S)+有(V)+O”表示隶属关系,而拉脱维亚语对应的则是存在句式“(在)我这里(介词短语)+有(存在动词)+名词短语(主格)”。等同于复合句的带分词短语的句式保存了下来。

文字以拉丁文字形式为基础,出现于16世纪。第一部立陶宛语著作是M. 马日维达斯的教理问答手册(1547年)。立陶宛标准语的发展过程始于16—17世纪。在这一时期,除了宗教内容的书籍之外,还出现了许多语文学性质的著作,其中包括D. 克莱因的立陶宛语法(1653, 1654年)。统一的标准语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奥克什泰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J. 雅布隆斯基对于立陶宛标准语的创建和规范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Литов. язык, в кн.- Язык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т. 1, М., 1966 (лит.).

Грамматика литов. языка, Вильнюс, 1985.

Otrebski Y., Gramatyka języka litewskiego, t. 1—3, Warsz 1956—1965.

Lietuviu kalbos gramatika, t. 1—3, Vilnius. 1965—1976.

Zinkeviciu s Z. .Lietuviu. dialektologija. Vilnius , 1966.

Его же, Lietuviu kalbos istorine gramatika t. Ir II. Vilnius, 1980—1981.

Его же . Lietuviu kalbos istorija, I. Lietuviu kalbos kilme, Vilnius , 1984 (изд.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Senn A., Handbuch der litauischen Sprache. Bd 1, Hdlb., 1966.

Kaztauska s J., Lietuviu kalbos istorine gramatika, Vilnius , 1968.

Palionis J., Lietuviu literaturines kalbos utoriga, Vilnius , 1979.

Sabaliauska s A., Lietuviu kalbos tyrineirao istorija, t. 1—2, Vilnius , 1979—1982.

Lietuviu kalbos zodynas. t 1—14, Kaunas — Vilnius , 1941—1986 (изд.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拉脱维亚语 (Латышский язык)

[原作者: В. Э. 斯塔尔特马涅 (В. Э. Сталтмане); 译者: 刘永红, 华中师范大学]

波罗的诸语言之一,主要通用于拉脱维亚。使用人口总数超过196万。拉脱维亚语有3种方言,即中拉脱维亚方言(拉脱维亚中部地区),是拉脱维亚标准语的基础;利沃尼亚方言(过去利夫人曾居住过的库尔泽姆北部和维则姆西北部,受其语言影响形成了该方言);上拉脱维亚方言(拉脱维亚东部,这种方言在拉特加尔当地被称作拉特加尔话,或拉特加尔语,曾受到斯拉夫语的极大影响。1730—1865年、1904—1959年期间,以拉特加尔地方话出版过书籍和报纸)。

与立陶宛语不同,拉脱维亚语的重音固定在第一音节上(或受到芬兰—乌戈尔底层语的影响);在多音节词的尾音节中,长元音变短,双元音单元音化,短元音(除u之外)脱落。古代的同音节(同一成音节)音组发生音变: an>uo, en>ie, in>i, un>ū; 前元音前的辅音改变: k>c, g>dz [ʒ]; 辅音系统的一个特点是后舌和中舌辅音 k/ķ, g/ġ 对立; 在长音节中

(在长元音、二合元音、“元音+ m, n, ņ, l, Ķ, r”音组充当成节音的音节中)保留了古代音节音调:长调(māte ‘母亲’)、锐音调(如 meīta ‘女儿’)、降调(rūoka ‘手臂’)。形态方面:中性和双数形式丧失,古代的工具格在单数中与受格重合,在复数中和与格重合;失去了词干以 u 结尾的形容词,保留了形容词的有定形式和无定形式;动词的特点是有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的简单形式和复合形式,第三人称没有数的区分,形成了独特的应该式和转述式。句中的词序是自由的,以 SVO 词序为主,被限定语位于定语之后。基本词汇是波罗的语固有词。借词源自日耳曼诸语言,尤其是中低地德语(elle ‘地狱’, mūris ‘石墙’, stunda ‘钟点’),源自斯拉夫语,尤其是俄语(bļoda ‘盆儿’, sods ‘惩罚’, grēks ‘罪过’)以及波罗的海沿岸—芬兰诸语言(kāzas ‘婚礼’, puika ‘男孩’等)。

文字以拉丁语的**哥特文字**为基础,出现于 16 世纪(第一部书是天主教教理问答(1585)。第一批书籍的语言(由略通拉脱维亚语的德国牧师用低地德语拼写法撰写)未能很好地反映拉脱维亚语的形态构造和语音系统,因此,研究方言和民间创作(特别是歌谣)对了解拉脱维亚语历史意义重大。拉脱维亚标准语自 19 世纪下半叶起逐步形成。现代拉脱维亚语的文字形式以拉丁字母(拉丁体铅字)为基础,增补了一些变音符号。拼写法以形态音位原则为基础。

Грабис Р., Латышский язык, в кн.: Язык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т. 1, М., 1966.

Endzelin J., Lettische Grammatik, Riga, 1922.

Endzelīns J., Latviešu valodas gramatika, Rīga, 1951.

Ozols A., Latviešu tautasdziesmu valoda, Rīga, 1961.

Mūsdienu latviešu literārās valodas gramatika, t. 1—2, Rīga, 1959—1962.

Rudzīte M., Latviešu dialektoloģija, Rīga, 1964.

Mūlenbachs K., Latviešu valodas vārdnīca. Rediģējīs, papildinājīs, turpinājīs J. Endzelīns, sēj. 1—4, Rīga, 1923—1932.

Endzelīns J., Hauzenberga E., Papildinājumi un labojumi K. Mūlenbacha Latviešu valodas vārdnīcai, sēj. 1—2, Rīga, 1934—1946.

Latviešu literārās valodas vārdnīca, sēj. 1—6, Rīga, 1972—1986 (изд.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Ozols A., Veclatviešu rakstu valoda, Rīga, 1965.

Bergmane A., Blinkena A., Latviešu rakstības attīstība, Rīga, 1986.

Krievu-latviešu vārdnīca, sēj. 1—2, Rīga, 1959.

Latviešu-krievu vārdnīca, sēj. 1—2, Rīga, 1979—1981.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爱沙尼亚语 (Эстонский язык)

[原作者: В. И. 帕尔 (В. И. Палль); 译者: 蔡晖, 北京外国语大学]

波罗的海沿岸—芬兰诸语言之一(属南支)。通用于爱沙尼亚(使用人口 130 余万),另分布于俄罗斯其它地区和瑞典、美国和加拿大。有 3 个方言组:北爱沙尼亚方言组(包括岛屿方言、西部方言、中北部方言和东部方言)、南爱沙尼亚方言组(包括穆尔克方言、塔尔图方言和维鲁方言)以及与波罗的海沿岸—芬兰诸语言北支有着许多相似特征的东北沿海方言。爱沙尼亚语不同于其他波罗的海沿岸—芬兰语言的特点是涉及所有长元音、二合元音、辅音和辅音组的长度级别交替: kōli (属格)、 kōli (部分格); laūlu (属格), laūlu (部分格); sil□mā (属格), silma (部分格)。爱沙尼亚语存在 3 个音位性质的长度级别对立: saDā ‘一百’, sādā ‘扔出’, sādā ‘得到’; lagī ‘天花板’, lak□kī ‘清漆’(属格), lakki ‘清漆’(部分格)。主重音落在第一音节上,次重音则在第三音节上。在第一音节中可以使用所有的元音(长、短)和二合元音;在非第一音节中只能使用元音 a, e, i, u 和尾音为-i 的二合

元音。

爱沙尼亚语的形态结构为屈折—黏着结构。内部屈折通过级别交替的方式体现，构成的词素形式不仅表示数范畴，而且表示格范畴。大部分格的单数和复数词尾相重合。名词有 14 种格形式。伴随格的产生要晚于其他格形式，是后置词成为接续成分的结果。动词有 4 种式，其中间接式出现得较晚。

关于爱沙尼亚语的最早记载（一些孤立的语句和词）产生于 13 世纪，而内容较丰富的文本自 16 世纪初为人所知。1535 年出现了第一部印刷书籍。16 世纪形成了两种标准语，分别以北爱沙尼亚方言和南爱沙尼亚方言为基础。19 世纪时，北爱沙尼亚标准语开始到处使用。统一标准语的形成过程起始于 19 世纪下半叶，其规范系统在 20 世纪上半叶得以形成。文字以拉丁字母系统为基础。

Каск А., Эстонский язык, в кн.: Основы финно-угор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Прибалтийско-финские, саамские и мордовские языки; М., 1975 (лит.).

Kettunen L., Viron kielen äännehistorian pääpiirteet, Hels., 1917 (3 painos, Hels., 1962).

Saareste A., Väike eesti murdeatlas, 1955.

Ariste P., Eesti keele foneetika, 2 trükk, Tartu, 1966.

Ratsep H., Eesti keele lihtlauset tüübid, Tallinn, 1978.

Русско-эстонский словарь, 2 изд., т. 1—2. Тал., 1975.

Мухель В. Э., Русско-эстонский словарь, 7 изд., Тал., 1982.

Wiedermann F. J., Ehstnisch-deutsches Wörterbuch, St. Petersburg, 1869 (4 trükk, Tallinn, 1973).

Tamm J., Eesti-vene sõnaraamat, Tartu, 1949.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摩尔多瓦语（Молдавский язык）

[原作者：К. В. 巴赫尼扬（К. В. Бахнян）；译者：张志军，哈尔滨师范大学]

罗曼诸语言之一（属巴尔干罗曼语次语支），通用于摩尔多瓦等地。使用人口超过 250 万人。有 4 个地方话组：西北地方话组、东北地方话组、中部地方话组、西南地方话组。摩尔多瓦语与罗马尼亚语接近并且具有同样的语法结构特征。在标准规范层面与罗马尼亚语区别很小，在语音系统（较大程度地接近于口语）和词汇系统（大多数是从俄语借用来的）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区别。

其标准语的形成过程起始于 16—17 世纪，临近 19 世纪下半叶时最终形成。文字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从 19 世纪起使用俄语世俗字体（1932—1939 年间曾使用拉丁字母）；1989 年通过改用拉丁文字形式的决议。在苏维埃时期产生了一批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术语，确立了语法和正字法的规范，扩大了标准语的功能语体系统。

Шимарев В.Ф., Ром. Языки Юго-Вост. Европы и нац. язык Молд. ССР, ВЯ, 1952, № 1.

Молд. язык, в кн.: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лит. Языков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в сов. эпоху, т. 3, М., 1973.

Филология советикэ молдовеняскэ, Кишинэу, 1974.

Гуцул Л.А., Рошкован Е.И., Молд. сов. яз-знание (1924—1974).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 указатель], Киш., 1975.

Рошкован Е.И.,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советикэ молдовеняскэ (1975—1980).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 указатель], Кишинэу, 1983.

Социально-ист. обусловленность развития молд. нац. языка, Киш., 1983.

Еремия А. И., Лунгу М. С., Молд. Ономастика (1924—1984), Киш., 1984.

Молд.-рус. словарь, М., 1961.

Рус.-молд. словарь, Киш., 1976.

Рус.-молд. словарь, т. 1—3, Киш., 1986—1988.

Молд.-рус. словарь, Киш., 1988.

Дикционар експликатив ал лимбий молдовенешть, вол. 1—2, Кишинэу, 1977—1985.

Скурт дикционар етимоложик ал лимбий молдовенешть, Кишинэу, 1978.

Дикционар диалектал (Кувинте, сенсурь, форме), вол. 1—5, Кишинэу, 1985—1986.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突厥诸语言 (Тюркские языки)

[原作者: Н. З. 加吉耶娃 (Н. З. Гаджиева); 译者: 陈勇,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原苏联、土耳其的许多民族和部族以及伊朗、阿富汗、蒙古、中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部分住民语言构成的语系。关于这些语言在发生学上归属**阿尔泰诸语言**的问题还处于假说层面, 这个假说将突厥诸语言、通古斯—满诸语言和蒙古诸语言设定为一个整体。根据一些学者[E. Д. 波利瓦诺夫、G. J. 拉姆斯泰特(又译兰司铁)]的观点, 该语系可将朝鲜语和日语纳入其中, 使范围更加扩大。还有一种乌拉尔—阿尔泰假说(M. A. 卡斯特伦、O. 伯特林克、H. 温克勒、O. 唐纳、Z. 贡博茨等)认为, 突厥诸语言以及其他阿尔泰语言与**芬兰—乌戈尔诸语言**一起构成乌拉尔—阿尔泰超语系。在阿尔泰学文献中, 突厥、蒙古、通古斯—满等诸语言之间的类型学相似有时被视为发生学上的亲属关系。阿尔泰假说的矛盾首先与构拟阿尔泰原型(архетип)时**历史比较方法**使用得不明确有关, 其次和区分固有词根与借词词根时缺乏准确的方法和标准有关。

在形成各别的一些突厥民族语之前, 这些语言的使用者经历过人数众多的、复杂的迁徙活动。5世纪时各古尔部落开始从亚洲向卡马河沿岸移动; 自5—6世纪起, 突厥各部落(奥古兹人等)开始从亚洲中部向中亚迁移; 10—12世纪期间, 古回鹘和奥古兹诸部落的迁居范围扩大起来(从亚洲中部向东部的中国新疆、中亚西部和小亚细亚地区); 图瓦人、哈卡斯人、山地阿尔泰人的祖辈曾结为一体; 第二个千年之初, 吉尔吉斯诸部落从叶尼塞河迁徙到现今的吉尔吉斯斯坦疆域; 15世纪哈萨克各部联合了起来。

根据现今地理分布, 可将突厥诸语言划分为以下一些地域: 中亚和东南亚、南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伏尔加河—卡马河沿岸、北高加索、外高加索和黑海沿岸等地域。突厥学中有几种不同的分类方案。

B. A. 博戈罗季茨基将突厥诸语言划分为7个语组: 东北语组(雅库特语、卡拉加斯语、图瓦语); 哈卡斯(阿巴坎)语组, 其中包括本区域哈卡斯住民说的萨盖、别利季尔、科伊巴尔、卡钦、克孜尔等地方话; 阿尔泰语组, 包括南部分支(阿尔泰语和特勒乌特语)和北部分支(所谓图巴拉尔人的方言等); 西西伯利亚语组, 包括西伯利亚鞑靼人的所有方言; 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山脉语组(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 中亚语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 西南语组(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库梅克语、加告兹语、土耳其语)。

这种分类方案的语言学标准不够充分和可信, 作为B. B. 拉德洛夫分类基础的纯语音特征也是如此, 他划分出4个语组: 东部语组(阿尔泰、鄂毕河、叶尼塞河突厥人和楚累姆鞑靼人的语言和方言, 以及卡拉加斯语、哈卡斯语、绍尔语、图瓦语); 西部语组(西西伯利亚鞑靼人的各种区域方言, 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巴什基尔语、鞑靼语以及约定的卡拉卡尔帕克语); 中亚语组(维吾尔语和乌兹别克语); 南部语组(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以及克里米亚鞑靼语中的一些南岸地方话); 雅库特语被拉德洛夫单独列出。

Ф. Е. 科尔什第一次将形态特征作为分类的基础, 认为突厥诸语言最初分裂为北部语组和南部语组; 南部语组后来解体为东支和西支。

在A. H. 萨莫伊洛维奇(1922)提出的精确化方案中, 突厥诸语言被划分为6个语组: p语组或称布加尔语组(其中也包括楚瓦什语); д语组或称维吾尔语组, 另称东北语组(除

了古回鹘语外，还有图瓦语、托法拉尔语、雅库特语、哈卡斯语)；**ray** 语组或称克普恰克语组，另称西北语组(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阿尔泰语及其方言、卡拉恰耶—巴尔卡尔语、库梅克语、克里米亚鞑靼语)；**таг-лык** 语组或称察合台语组，另称东南语组(现代维吾尔语、不含克普恰克方言的乌兹别克语)；**таг-лы** 语族或称克普恰克—土库曼语组(过渡性的地方话——失去了独立意义的希瓦—乌兹别克诸和希瓦—萨尔特诸土话)；**ол** 语组或称西南语组，另称奥古兹语组(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克里米亚鞑靼语的南岸诸方言)。

之后陆续有新的分类方案提出，每一种都试图精准地将语言划分成组群，并且把各种古突厥语纳入其中。如拉姆斯泰特划分了6个基本语组：楚瓦什语；雅库特语；北部语组(按A. M. O. 拉塞农的分类为东北语组)，其中包括阿尔泰和毗连地区的所有突厥语及其方言；西部语组(拉塞农分类的西北语组)，包括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库梅克语、卡拉恰耶语、巴尔卡尔语、卡拉伊姆语、鞑靼语和巴什基尔语，属于该语组的还有消亡的库曼语和克普恰克语；东部语组(拉塞农分类的东南语组)，即新维吾尔语和乌兹别克语；南部语族(拉塞农分类的西南语组)，包括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和加告兹语。J. 本青和 K. H. 门格斯提出的分类也是与此类似的上述一些方案的变体。作为C. E. 马洛夫分类基础的是年代特征：所有的语言均按“古代”、“近代”和“现代”划分。

H. A. 巴斯卡科夫的分类和上述分类有根本的区别。按照他的原则，突厥诸语言的分类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各突厥民族和语言发展史的时代划分，这种发展史呈现错综复杂的场景，原始社会小规模氏族联盟产生、解体，随后大规模部族联盟产生，这些大部族联盟虽然起源相同，但建构的却是部族组成各不相同的共同体，它们的部族语言组成当然也各不相同。

上述分类方案尽管都有不足之处，但却帮助我们厘清了突厥诸语言的那些发生学关系最近的组群。对将楚瓦什语和雅库特语作为特殊种类区分提出了充分的根据。为了制定更加准确的分类方案，必须考虑到突厥诸语言十分复杂的方言切分，以扩大区别特征的集合数量。在描写个别的突厥语时，最被公认的分类方案是萨莫伊洛维奇提出的方案。

类型学上突厥诸语言属于黏着语。词根(词干)由于不附加类别标记(突厥诸语言中名词没有类别的划分)，用于主格时以光杆形式出现，因此成为变格形式聚合体的组织中心。**聚合体**的轴向结构，即以一个结构中轴为基础的结构，对语音变化过程的性质产生了影响(具有在词素之间保留清晰边界的趋势，阻碍聚合体中轴本身的形变、词干形变等)。**元音和谐**是突厥诸语言黏着性的伴生现象。

存在元音和谐及与之相关的前舌辅音与后舌辅音的对立、突厥语固有词在词首和词素的结合处或者词末尾没有数个辅音连缀、音节的特殊类型等特征决定了突厥诸语言中相对简单的音位分布关系。

突厥诸语言中腭音性/非腭音性特征的和谐表现得比较一贯，试比较土耳其语 *evler-in-de* ‘在他们的房子里’、卡拉恰耶—巴尔卡尔语 *бар-ай-ым* ‘我就去吧’等。唇元音和谐在不同的突厥语中发展程度不同。

有一种假说认为，早期突厥共同语有8个元音音位，这些音位可能是短元音或长元音：**a, ə, o, y, ɵ, ʏ, ы, и**。关于突厥诸语言中是否曾有闭元音 **e** 的问题还存在争议。古突厥语元音系统后来变化的特点是，大多数突厥语失去了长元音。长元音主要保留在雅库特语、土库曼语、哈拉吉语中；其他突厥语只保留下来长元音的个别残迹。

在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和古楚瓦什语中，许多词词首音节中的/a/发生了向圆唇化后移的/a^o/的变化，试比较**кара* ‘黑色的’，古突厥语和哈萨克语为 *кара*，但鞑靼语为 *қа^oра*；**ат* ‘马’，古突厥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哈萨克语为 *ат*，但鞑靼语、巴什基尔语为 *а^oт*

等。也发生了/a/向圆唇/o/的变化，这在乌兹别克语中很典型，试比较*باش‘头’与乌兹别克语 бош。维吾尔语中可见到/a/受下一音节中/и/的影响而发生元音变音的现象（以 ети‘他的马’取代 аты）；阿塞拜疆语和新维吾尔语中保留了短音 ə（试比较 кэл-‘（你）来！’，阿塞拜疆语为 гэл’，维吾尔语为 кэл-），而多数突厥语中 ə > e（试比较土耳其语中的 gel-和诺盖语、阿尔泰语、吉尔吉斯语中的 кел-等）。在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哈卡斯语以及楚瓦什语（部分）中 ə > и 的变化都很典型，试比较*əт‘肉’，鞑靼语为 ит。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和卡拉恰耶—巴尔卡尔语中可发现词首的一些元音发类二合元音，图瓦语和托法拉尔语中存在咽化元音。

突厥诸语言的辅音系统可用表格形式表示如下：

按发音性质		按发音部位				
		舌根软腭音	舌根音	舌面音	前舌音	唇音
塞音	清音	к	к		т	п
	浊音		г		д	б
擦音	清音					
	浊音	ғ		ј	ғ', з, ғ	
塞擦音	清音				ч	
	浊音				дж	
响音 擦音	边音				л, -л	
	颤音				р	
	流音		н		н	м

所谓奥古兹诸语言允许浊塞辅音出现在词首；克普恰克诸语言也允许这个位置出现塞辅音，但清塞音占多数。

在突厥诸语言的辅音变化过程中，发音动作或多或少复杂的音素常简化或者变化为另外性质的语音：双边音 л 和齿间音 з 消失；软腭音 қ 在许多语言中变为普通的舌面音 к 或 х（试比较*кара‘黑色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及哈萨克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卡拉恰耶—巴尔卡尔语、维吾尔语为 кара，但土耳其语为 kara，楚瓦什语为 хура）。处于元音之间的辅音一律浊化（在楚瓦什语，特别是西伯利亚诸突厥语中很典型），辅音有大量同化现象，特别是在词缀中，前元音之前 к > ч, т > ч（试比较阿塞拜疆、土耳其、维吾尔等语言的方言：чим < ким‘谁’）。在许多突厥语中都可见到的词首 й-变为塞擦音的现象，也可以用突厥诸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来加以解释。试比较*йэр‘土地’，阿塞拜疆语为 йэр，但吉尔吉斯语为 жер（这里的/ж/表示浊塞擦音），哈卡斯语为 чир，图瓦语为 чер。在其他的情况下，音素的变化可能在相邻非亲属语言的影响下发生：突厥语辅音系统在雅库特语中的根本变化、在楚瓦什语中某种程度的变化，以及高加索和西伯利亚一些突厥语中送气塞辅音的出现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除雅库特语之外，所有突厥语的名词性词类都有 6 个格。主格没有标记，属格的形式标记为 -ын/-ин、-ың/-иң，宾格以 -ы/-и、ны-ни 为标记，有些语言属格和宾格词缀以 -н 起始，与格—方向格的形式标记是 -қа/-гә、-а/-ә，处所格的形式标记为 -та/-гә、-да/-дә，起始格的标志为 -тан/-гән、-дан/-дән。在一些同化过程发达的语言中，属格词缀变体为 -тын/-дың，宾格词缀变体为 -ты/-ды，等等。楚瓦什语中由于元音之间的 -з- 发生 г 音化，产生起始格和处

所格的变体形式-ра 和-ран; 与格和宾格在该语言中共用相同的标记-a/-e、-на/-не。

在所有突厥语中,复数都借助词缀-лар/-ләр 表达,但楚瓦什语除外,行使这一功能的是词缀-сем。领属范畴借助附加到词干上的人称词缀系统表达。

数词包括表示从 1 到 10 以及 20, 30, 40, 50, 100, 1000 的词汇单位;表示 60, 70, 80 和 90 用复合词,其第一部分是相对应个位数的语音变体名称。一些突厥语有另外一种按照模式“从 1 到 10 的单位名称 + он ‘10’”构建表示“几十”数词的系统,试比较哈卡斯语 алт-он ‘60’、雅库特语 төртүөн ‘40’。

突厥诸语言中的指示代词反映了事物在空间中所处的 3 种位置:最接近说话人的(如土耳其语 bu ‘这个’、楚瓦什语 ку ‘这个’);稍远一些的(土耳其语 şu ‘就那个’、吉尔吉斯语 ошол ‘就那个’);最远的(土耳其语 о ‘那个’、吉尔吉斯语 ал ‘那个’)。

人称代词形态范畴聚合体包括 3 种人称的单复数形式;在一些语言中,人称代词变格时单数与格一方向格的词干元音会发生变化,试比较:土耳其语 ben ‘我,主格’/bana ‘我,与格一方向格’,吉尔吉斯语 мен ‘我,主格’/мага ‘我,与格一方向格’。

有两种疑问代词词干:试比较乌兹别克语和诺盖语 ким ‘谁’、кимлар ‘谁’(指人)/нима ‘什么’、нималар ‘什么’以及诺盖语 не ‘什么’(指物)。

反身代词的基础是独立的名词,大多数突厥语以独立名词 өз ‘内脏’、‘果仁’为基础,如阿塞拜疆语和吉尔吉斯语 өзүм ‘我本人’;绍尔语、哈卡斯语、图瓦语、阿尔泰语和托法拉尔语用表示‘身体’意义的词,试比较绍尔语 позым、图瓦语 бодум、阿尔泰语 бојым ‘我本人’;雅库特语用 бэйэйэ ‘身体’,如 бэйэйэм ‘我本人’;土耳其语和加告兹语的反身代词以 kendi 为基础构成,如 kendim ‘我本人’。

动词变位系统中使用两类人称词尾。第一类为语音上形变的人称代词,用于动词变位现在时、将来时以及完成时和过去完成时。第二类是与物主词缀相关的词尾,用于以-ды 结尾的过去时和条件式。

以-a 结尾的现在时形式用得最普遍,这一形式还时常有将来时的意义(在鞑靼语、巴什基尔语、库梅克语、克里米亚—鞑靼语以及中亚突厥语和西伯利亚鞑靼人的方言中)。所有突厥语中都有以-ар/-ыр 结尾的现在—将来时形式。土耳其语的现在时形式以-yor 结尾为特点,而土库曼语以-йар 结尾为特点。以-макта/-махта/-мокда 结尾的即时现在时形式见于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乌兹别克语、克里米亚—鞑靼语、土库曼语、维吾尔语、卡拉卡尔帕克语中。突厥诸语言有按照模式“以 a-或-ып 结尾的副动词+特定类型助动词的现在时形式”构建即时现在时特殊形式的趋势。

共同突厥语以-ды 结尾的过去时形式有语义容量大和体的意义中立的特点。在突厥诸语言的发展过程中,经常表现出创建过去时形式兼表各种体范畴意义的趋势,特别是表示过去的持续行为(试比较:卡拉姆伊语 алып едим ‘我拿过’这类不定未完过去时)。许多突厥语(主要是克普恰克诸语言)通过将第一类人称词尾(语音形变的人称代词)附加到-кан/-ган 结尾的形动词上而构成完成时。土库曼语中存在以-ан 结尾的词源上有亲属关系的形式,楚瓦什语中的亲属关系形式以-ны 结尾。奥古兹语族的语言中以-мыш 结尾的完成时比较普遍,雅库特语词源上有亲属关系的形式以-быт 结尾。过去完成时的词干和完成时词干一样,与助动词 быть 的过去时词干形式组合而成。

除楚瓦什语外的所有突厥语中,将来时(现在—将来时)都以-ыр/-ар 为标记。奥古兹诸语言的特点是存在以-аджак/-ачак 为结尾的绝对将来时形式,这种形式在南部地域的一些语言(乌兹别克语和维吾尔语)中也很普遍。

突厥诸语言除陈述式以外还有愿望式、命令式、条件式和应该式。愿望式最常见的标记为-гай(克普恰克诸语言)和-a(奥古兹诸语言);命令式有自身的形态范畴聚合体,动词的光杆词干表达对单数第二人称的命令;条件式有 3 种构成模式,分别带特别的标记-ca(大

多数语言)、-сар (见于鄂尔浑铭文和古回鹘语文献以及 10—13 世纪的突厥语文本中), 而现代诸语言只以语音转换的形式保留在雅库特语中) 以及-сан (楚瓦什语); 应该式主要见于奥古兹诸语言中 (试比较阿塞拜疆语中的 кәлмәлијәм ‘我应该来’)。

突厥诸语言有主动态 (与词干吻合)、被动态 (标记为附加在词干上的-л)、反身态 (标记为-н)、相互反身态 (标志为-ш) 和强制态 (标记多样, 最常见的是-дыр/-тыр, -т, -ыз, -гыз)。

突厥诸语言中的动词词干与体的表达无关。各别时间形式或由助动词赋予其体特征的特殊复合动词可具有体的意义色彩。

突厥诸语言以各种不同的动词、名词标记表示否定: 动词中用词缀-ма < -ба; 名词中奥古兹诸语言采用 дейил ‘没有, 不存在’ 一词, 克普恰克诸语言由 эмес 表达。

基本词组类型 (无论限定词组, 还是述谓词组) 的构成模式在突厥诸语言中是一致的: 从属成分在主导成分之前。突厥诸语言中典型的句法范畴是**被领属语附加成分** (изафет): 两个名词之间的这种关系类型贯穿突厥诸语言的全部结构。

突厥诸语言中名词类或动词类句型由谓语的语法表达性质所决定。简单名词句模式是突厥诸语言共同的, 其述谓性由系词的类似成分 (谓语句词缀、人称代词、各种述谓词) 表达。而突厥诸语言共有的带形态支撑成分的各种动词类句型 (以-ды 结尾的过去时形式和以-а 结尾的现在—将来时) 的数量相对不多; 大多数动词类句型形成于地域共同体 (试比较: 克普恰克语地域所固有的带-ган 构形成分的动词类句型, 或者奥古兹语地域特有的带-мыш 构形成分的动词类句型等)。简单句在突厥诸语言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句法结构, 它们尽量将所有有潜在可能的复合句也纳入进来, 只要从句的结构不与简单句构建规则相矛盾、可以改造成简单句的从属成分。各种从属关系通过形动词、副动词和动名词组等构式表达。

突厥诸语言的构造也为发展连接词句准备了条件。在连接词型复合句的发展过程中, 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影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操突厥诸语言者与俄罗斯人经常接触也促进了连接手段的发展 (如鞑靼语)。

在突厥诸语言的构词法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词缀法 (参见**词缀**)。也有分析性的构词方式: 如成对名词、重叠词、合成动词等。

突厥诸语言最古老的文献产生于 7 世纪 (参见**古突厥诸语言**)。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初, 原苏联所有突厥语的文字均以俄语文字形式为基础。土耳其语使用以拉丁语文字形式为基础的字母系统。

Мелиоранский П. М., Араб филолог о турецком языке, СПб, 1900.

Богородицкий В. А., Введение в татар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Казань, 1934; 2 изд., Казань, 1953.

Малов С. Е.,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М.-Л., 1951.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ч. 1—4, М., 1955—1962.

Баскаков Н. А., Введение в изучение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М., 1962; 2 изд., М., 1969.

Его же, Историко-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ая фонология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М., 1988.

Щербак А. М.,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фонетика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Л., 1970.

Севортян Э. В.,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т. 1—3], М., 1974—80.

Серебрянников Б. А., Гаджиева Н. З.,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Баку, 1979; 2 изд., М., 1986.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Фонетика. Отв. ред. Э. Р. Тенишев, М., 1984.

То же, Морфология, М., 1988.

Grønbech K., Der türkische Sprachbau, v. 1, Kph., 1936.

Gabain A.,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Lpz., 1941; 2. Aufl., Lpz., 1950.

Brockelmann C., Osttürkische Grammatik der islamischen Literatursprachen Mittelasiens, Leiden, 1954.

Räsänen M. R., Materialien zur Morphologie der türkischen Sprachen, Hels., 1957 (Studia Orientalia, XXI).
Philologiae Turcicae fundamenta, t. 1—2, [Wiesbaden], 1959—1964.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哈萨克语 (Казахский язык)

[原作者: К. М. 穆萨耶夫 (К. М. Мусаев); 译者: 许宏, 上海外国语大学]

突厥诸语言之一, 通行于哈萨克共和国、与其相邻的俄罗斯部分地区, 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和吉尔吉斯的各别地区。中国、蒙古、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有部分地区使用。使用人口总数约 800 万。哈萨克语没有明确的方言划分, 某些地方话在词汇和语音方面有微小的差别。

语音的特点是: 有 9 个元音音位, 词的第二个音节前 (含第二个音节) 一贯遵循腭元音和谐 (根据舌位抬高程度发生同化), 遵守唇元音和谐 (根据唇化程度发生同化; 参见元音和谐)。在形态方面有词缀-атын/-егін, 用以构成时间形式和形动词。句法方面存在大量的形动词和副动词结构, 简单句和复合句的成素之间使用连接词联系的情况有限。词汇中保留着基本的共同突厥语词层, 阿拉伯和波斯借词数量不多。

19 世纪在全民语言的基础上形成了哈萨克语标准语。书面古文献始自 19 世纪。其文字 1930 年前以阿拉伯文字形式为基础, 后改以拉丁字母为基础, 而从 1940 年起以俄语文字形式为基础。

Мелиоранский П. М., Крат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казахско-киргизского языка, ч. 1—2, СПб., 1894—1897.

Мусабаев Г. Г.,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казахский язык, ч. 1. Лексика. Алма-Ата, 1959.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казахский язык. Фонетика и морфология, Алма-Ата, 1962.

Жубанов 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казахскому языку, Алма-Ата, 1966.

Мусаев К., Казахский язык, в кн.: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языков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в советскую эпоху, М., 1969.

Қалиев Ғ., Сарыбаев Ш., Қазақ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ясы, Алматы, 1979.

Қазақ әдеби тілінің қалыптасу тарихы мен даму жолдары, Алматы, 1981.

Томанов М., Қазақ тілінің тарихи грамматикасы. Фонетика, морфология, Алматы, 1981.

Махмудов Х. Х., Мусабаев Г. Г., Казах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Алма-Ата, 1954.

То же, Алма-Ата, 1987.

Қазақ тілінің түсіндірме сөздігі, т. 1—10, Алматы, 1974—1986.

Кенесбаев І., Қазақ тілінің фразеологиялық сөздігі, Алматы, 1977.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吉尔吉斯语 (Киргизский язык)

[原作者: Л. И. 列别杰娃 (Л. И. Лебедева); 译者: 许宏, 上海外国语大学]

突厥诸语言之一, 分布于吉尔吉斯以及乌兹别克纳曼干州、安集延州和费尔干纳州的部分地区, 塔吉克一些山区, 哈萨克与吉尔吉斯比邻的地区,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蒙古西部地区,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东北部。国内使用人口总数 304 万多。在吉尔吉斯共和国有两个方言组: 北部方言组和南部方言组。按另一种分类法, 则划为北部方言组、西南部方言组和东南部方言组。这些方言主要在语音和词汇上有所区别。

吉尔吉斯语语音方面的特点有: 8 个长元音 (次生长元音) 音位和 8 个短元音音位对立, 元音和谐一贯得到遵循, 词首出现浊塞擦音 ж[дж], 相应于其他突厥诸语言中词首的 й-/ж-/дь-等, 词末的浊辅音只可能是单焦点擦音 ɣ/ɣ̣。具有突厥诸语言典型的形态系统。指示代词通常有两种形式: 词末带-л 或不带-л (бул / бу ‘这个’)。动词的否定体 (形式) 借

助词缀-ба-等构成，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借助否定词 эмес 以分析形式表示。词汇中有相当一部分形象摹拟词。

以北部方言为基础的标准语中有数量不多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许多借词源自俄语。标准语中词汇的扩充主要是通过吉尔吉斯语自身的手段，20世纪60至80年代南部方言的语汇涌入标准语的力度增大。在句法上，分析性动词结构发达。主从复合句成素间用连接词联系的现象并不典型，更常用的联系方式是从句谓语的形态变化。

民族文字创建于1924年，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1926年改为以拉丁字母为基础，1940年起以俄语文字形式为基础。

Юнусалиев Б. М., Киргизский язык, в кн.: Язык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т. 2, Тюркские языки, М., 1966 (лит.).

Киргиз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ст. К. К. Юдахин, М., 1940; 2 изд., М., 1965.

Русско-киргиз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57.

Кыргыз тилинин фразеологиялык сөздүгү, Фр., 1980.

Карасаев Х., Накыл сөздөр, Фр., 1982.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乌兹别克语 (Узбекский язык)

[原作者: А. А. 科夫绍娃 (А. А. Ковшова); 译者: 许宏, 上海外国语大学]

突厥诸语言之一，分布于乌兹别克以及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使用人口总数超过1230万)，此外还主要分布在阿富汗北部和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使用人数约160万)。

在克普恰克、乌古兹和葛逻禄—察合台—回鹘三大语言共同体基础上形成的乌兹别克语以方言组成复杂为特点，各种地方语的差异非常显著(若干塔什干型的地方话、撒马尔罕—布哈拉、费尔干纳、南花刺子模等地的各种地方话等)。乌兹别克语的语音特点为：既无唇元音和谐，也无腭元音和谐(试比较：乌兹别克语 учди / 土库曼语 uçtu ‘他乘飞机离开了’、乌兹别克语 кўллар ‘手(复数)’和 кўллар ‘湖(复数)’ / 土库曼语 kollar, göller)；但是有一些地方话保留了元音和谐。形态系统的特征是各种词缀的形式都只有单一选项，这是无元音和谐造成的结果。词汇系统中有大量源自波斯语和塔吉克语的借词。

古乌兹别克标准语于15世纪逐渐形成(诗人阿利舍尔·纳沃依的创作)，自16世纪起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但仍然保留着书面语的形式，较之鲜活的口语距离很远。20世纪30至60年代，乌兹别克语言学工作者将察合台书面文字语言命名为“古乌兹别克语”(基于从察合台书面语中区分出来的“古乌兹别克语”成分)。现代乌兹别克标准语在塔什干和费尔干纳地方话的基础上形成于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无古乌兹别克标准语的影响)，现已成为一种多功能的语言，服务于乌兹别克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文字1927年前曾以阿拉伯字母系统为基础，后改用拉丁字母，1939年起以俄语文字形式为基础。

Поливанов Е. Д., Введение в изучение узбек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1, Таш., 1925.

Боровков А. К., Вопросы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и узбекских говоров, «Известия АН Узбекской ССР», 1953, № 5.

Кононов А. Н., Грамма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узбек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М.-Л., 1960 (лит.).

Решетов В. В., Основы фонетики и грамматики узбекского языка, 2 изд., Таш., 1965.

Его же, Узбекский язык, в кн.: Язык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т. 2, М., 1966 (лит.).

Щербак А. М., Грамматика староузбек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Л., 1962.

Фуломов А. Г., Аскарлова М. А., Ҳозирги ўзбек адабий тили. Синтаксис, Тошкент, 1965.

Узбек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59.

Ўзбек тилининг изоҳли луғати, т. 1—2, М., 1981.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土库曼语 (Туркменский язык)

[原作者: E. A. 波采鲁夫斯基 (E. A. Поцелуевский); 译者: 许宏, 上海外国语大学]

突厥诸语言之一, 分布于土库曼共和国以及乌兹别克 (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塔吉克、哈萨克和俄罗斯联邦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部分地区 (使用人口超过 200 万), 还分布于伊朗 (使用人口约 70 万)、阿富汗 (使用人口约 35 万)、土耳其 (使用人口约 12 万)、伊拉克 (使用人口约 20 万)。使用人口总数约 380 万。基本方言有: 特克、约穆德、埃尔萨里、萨利尔、萨雷克、乔弗杜尔等方言和其他一些使用人口较少的方言。斯塔夫罗波尔土库曼人的方言被称为特鲁赫曼语。

土库曼语在乌古兹人西部各部落语言的基础上形成, 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又获得了克普恰克语组突厥语的一些特点。土库曼语的特征是: 存在原生性长元音, 有齿间音 ζ 和 ζ (以替代其他突厥语的 c 和 z), 唇元音和谐发达; 有以 $-p$ 结尾的不定将来时词缀否定形式变体 (除与其他突厥语共有的以 $-маз/-мез$ 结尾的形式外) 等。

老土库曼标准语主要是诗歌语言。1917 年十月革命后, 土库曼诸多方言在特克方言的基础上得以统一, 并由此形成了现代土库曼标准语。土库曼语 1928 年前曾使用阿拉伯字母, 后改用拉丁字母, 1940 年起使用俄语文字形式为基础的文字。

Баскаков Н. А., К истории изучения туркменского языка, Ашхабад, 1965.

Грамматика туркменского языка, ч. 1. Фонетика и морфология, Ашхабад, 1970.

Поцелуевский А. П.,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Ашхабад, 1975.

Туркмен дилиниң диалектлериниң очерки, Ашгабат, 1970.

Туркмен дилиниң грамматикасы. Бөлүм 2. Сөз дүзүмининң ве йенекей сөзлемиң синтаксиси, Ашгабат, 1977.

Байлыев Х., Сайланан ишлер, Ашгабат, 1981.

Русско-туркмен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56.

Туркмен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68.

Большой русско-туркмен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 1—2, М., 1986—1987.

Туркмен дилиниң сөзлүги, Ашгабат, 1962.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阿塞拜疆语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ий язык)

[原作者: Н. З. 加吉耶娃 (Н. З. Гаджиева); 译者: 许宏, 上海外国语大学]

突厥诸语言之一, 分布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部分地区。使用人口总数约 1400 万, 其中在原苏联约 540 万。阿塞拜疆语有 4 个方言组: 1) 东部方言组 (库巴、巴库和舍马哈方言、穆甘和连科兰地方话); 2) 西部方言组 (哈萨克、卡拉巴赫和干加方言、阿依鲁姆地方话); 3) 北部方言组 (努哈方言、扎卡特雷—卡希地方话); 4) 南部方言组 (纳希切凡、奥尔杜巴德和塔夫里兹方言, 埃里温地方话)。各方言间的区别主要涉及语音和词汇方面。

阿塞拜疆语是所谓乌古兹突厥语中的一种, 具有克普恰克地区诸语言的属性。语音的突出特点很多。音位 ə 在所有位置上的使用频率都很高; 存在所谓的 *mediae lenes* (不完全浊辅音), 它们一方面受制于词首辅音的浊化, 另一方面又受到词首和词尾的清塞辅音 п , т , к 送气的制约。词首在有大量浊辅音的同时, 也会见到清辅音 (试比较: бармак ‘手指’, 但是 палчыг ‘污泥’); 突厥语固有的 к/к 会发生响音化 (阿塞拜疆语 ган < кан ‘血’) 和擦音化 (начан < качан ‘何时’); 存在发音部位前移现象: 在前元音前 $\text{к} > \text{г}$ (书写为 кэл-

< кел- ‘(你) 来吧’), к > ч, г > дж (书写为 ч), j 稳定出现在后元音之前, 但在前元音前消失 (试比较 *јаман* ‘坏的’ / *ил* ‘年’)。形态方面, 单数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谓语句缀只有带宽元音的变体; 复数第一人称的谓语句标志是前面带窄元音的词缀-г/-к。与其它突厥语不同, 阿塞拜疆语中作为现在—将来时和现在时标记的词缀-ар 和-ыр, 在语音、语义上都有区别。句法方面, 连接词复合句系统发达。

其文字在 1929 年前以阿拉伯语文字形式为基础, 1929—1939 年间以拉丁字母为基础, 1939 年起以俄语文字形式为基础。阿塞拜疆标准语的发展始于 13 世纪。苏维埃时期的阿塞拜疆现代标准语建立在舍马哈和巴库方言的基础上。

Гаджиева Н. З.,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ий язык*, в кн.: *Язык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т. 2 — *Тюркские языки*, М., 1966 (лит.).

Грамматика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ого языка, Баку, 1971.

Ахундов А., *Азәрбајҹан дилинин фонемләр системи*, Бақы, 1973.

Мүасир азәрбајҹан дили, т. 1—2, Бақы, 1978—1980.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ого языка, Баку, 1964.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ст. Х. А. Азизбеков, Баку, 1965.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高加索(伊比利亚—高加索)诸语言 [Кавказские (Иберийско-кавказские) языки]

[原作者: Г. А. 克利莫夫 (Г. А. Климов); 译者: 宁琦, 北京大学]

高加索近 40 种本地 (原本就有的) 语言的约定总称, 分布于北高加索、外高加索、土耳其。操高加索 (伊比利亚—高加索) 诸语言的一些小型群体还分布在叙利亚、伊朗和其他一些近东国家。使用人口总数约 700 万。高加索 (伊比利亚—高加索) 诸语言可划分为 3 个语族: **阿布哈兹—阿迪格诸语言、卡特维尔诸语言和纳赫—达吉斯坦诸语言**。根据另一种分类法 (Ю. Д. 杰舍利耶夫等), 纳赫—达吉斯坦语族被一分为二: 纳赫诸语言和达吉斯坦诸语言。阿布哈兹—阿迪格和纳赫—达吉斯坦诸语言常被称为北高加索 (或山地伊比利亚—高加索) 诸语言, 以区别于外高加索的卡特维尔诸语言, 或称南高加索诸语言。

尽管高加索 (伊比利亚—高加索) 诸语言的各个语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结构和建构材料上的差异, 但可在它们之间揭示出一系列对等的现象。妨碍证明这些语言在发生学上同源的假设 (由 П. К. 乌斯拉尔远在 19 世纪提出) 是由于**词源学**研究落后的缘故: 各语族原始语之间规律性的语音对应没有建立起来 (如没有一系列原始语层面上的语音对应可以证明阿布哈兹—阿迪格和纳赫—达吉斯坦诸语言间有亲缘关系)。由于除格鲁吉亚语外的高加索诸语言缺少古文字传统, 致使历史比较研究客观上陷入困境。虽然提出了大量的假设 (参见**高加索学**), 但主要由非高加索学者从事研究的高加索诸语言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发生学关系依然是不清楚的。

高加索语言各个语族间的结构差异很大。例如, 阿布哈兹—阿迪格诸语言的特点是: 语音系统中的辅音丰富, 元音贫乏, 语法方面, 由于名词变格或缺失, 或只有最低限度的发展, 因而动词变位形成了多人称原则 (多达 4 个行为参与者的表达方式)。卡特维尔诸语言的语音特点是: 语篇中的辅音高度饱和, 无边噪辅音, 动词词根通常是双辅音结构; 语法以及物动词有态的区分、主从复合句发达为特点。纳赫—达吉斯坦诸语言的典型特征是: 名词类别系统 (2—8 类), 语法上与该系统相应的是类别的形态范畴, 该范畴通过与名词发生句法联系的词类 (动词、形容词) 表示出来并发挥功能; 格的聚合体数量庞大 (有时达 40 个左右), 这是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没有的。

如果从形式类型学和特征学的角度来考察, 高加索诸语言具有以下共同特点: 元音数

量有限（一些纳赫—达吉斯坦语言除外，它们有多达 24 个元音），辅音系统种类繁多；在词变和构词过程中，前缀与后缀系统同样参与；屈折特点为辅，黏着形态类型为主（在所有语族中都可以不同程度地观察到元音**形态音位交替**[аблаут]系统，这个系统通常被视作古旧系统）。在句子词序方面，可以发现一些相同点（动词谓语趋向置于句末，直接宾语趋向置于谓语前，而定语置于被限定的成分之前）。从总的形式结构特征看，卡特维尔语的结构特点介乎于阿布哈兹—阿迪格语和纳赫—达吉斯坦语之间，试比较高加索地域卡特维尔语言区自西向东呈现的一系列特点：屈折特征逐渐增强、前缀法的作用逐渐减弱、名词变格系统逐渐复杂化，而相反的则是动词变位系统逐渐简化、构词类型逐渐减少以及其他一些特点。然而，总地说来，在形式类型学方面，卡特维尔诸语言更接近阿布哈兹—阿迪格诸语言。还可发现卡特维尔诸语言和阿布哈兹—阿迪格诸语言之间的一些词汇平行的现象。以上述前提为基础，可建立起卡特维尔语族和阿布哈兹—阿迪格语族之间可能存在变体发生学（后天获得）的“亲缘关系”的假设。还发现了卡特维尔诸语言与印欧诸语言之间的一些结构平行对等和建构材料吻合的现象（不过，其中一部分只能视为远古时代的借词）。

在内容类型学方面，高加索诸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迥然不同。阿布哈兹—阿迪格诸语言和纳赫—达吉斯坦诸语言都有**作格**结构，尽管在纳赫—达吉斯坦诸语言中该结构体现得并不很始终如一（往往不存在作格系列的动词词缀；时常使用非兼容的作格，即语义上的单纯主体作格；可能使用及物动词谓语，但不构成作格结构句，而构成所谓一般结构句）。卡特维尔诸语言的独特性是兼有作格（更准确地说，是主动）类型与主格类型的特点（有规律地构成及物动词的态配位结构，也许甚至可以说，它们的主格性特点更多；参见**主格**结构）。

高加索诸语言通行区相互关系的研究十分薄弱。有关存在所谓高加索语言联盟（其组成不仅包括高加索地区的当地诸语言，而且还包括高加索地区的印欧诸语言）的看法没有得到证实，虽然曾指出过语音系统的类似关系和熟语组成的相同关系等。关于阿布哈兹—阿迪格语是西格鲁吉亚卡特维尔诸语言底层语的假设，得到 С. Н. 贾纳希阿的支持。有些事实说明，过去曾存在过一个由卡特维尔语区和印欧语通行区组成的语言联盟，如共同卡特维尔语的形态音位系统与古代印欧语有同构性（对应）。高加索诸语言与西亚古代语言通行区联系的研究，不仅在纯语言学方面，而且在文化历史的方面，都已开始。

所有高加索语言中，只有格鲁吉亚语有古代文字传承下来。甚至乌金语也可能有过文字（参见**阿格万文字**）。主要始于中世纪晚期，曾经为其他一些高加索语言（如阿瓦尔语、拉克语、达尔金语）作过以阿拉伯书写法为基础创建文字的尝试。只是在 1917 年十月革命后，高加索的积极语言建设才广泛地开展起来。创立文字，研制字母表，完善拼写法，确定各种标准语的方言基础，理顺标准语的规范，建立一系列规范语法和词典。许多高加索语有了广播。新文字标准语（阿布哈兹、阿巴津、阿迪格、卡巴尔达—切尔克斯、车臣、印古什、阿瓦尔、拉克、达尔金、列兹金、塔巴萨兰等语言）正经历着蓬勃发展的过程。有关高加索（伊比利亚—高加索）诸语言的研究可参见**高加索学**。

Джавахишвили И. А.,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ый строй и родство грузинского и кавказских языков, в его кн.: Введение в историю грузи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т. 2, Тб., 1937 (на груз. яз.).

Качарава Г. Н., Топурия Г. В.,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языковед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об иберийско-кавказских языках, ч. 1, Тб., 1958.

Дешериев Ю. Д.,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нахских языков и проблемы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горских кавказ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Грозный, 1963.

Климов Г. А., Кавказские языки, М., 1965.

Иберийско-кавказские языки, в кн.: Язык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т. 4, М., 1967.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языков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в советскую эпоху. [Иранские и кавказские языки], под ред. Ю. Д. Дешериева, М., 1969.

-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общности кавказских языков. М., 1978.
- Языки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т. 3, М., 1979.
- Чикобава А. С., Введение в иберийско-кавказ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Тб., 1979 (на груз. яз.).
- Климов Г. А., Алексеев М. Е., Типология кавказских языков, М., 1980.
- Очерки морфологии иберийско-кавказских языков, Тб., 1980 (на груз. яз.).
- Климов Г. А., Введение в кавказ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М., 1986.
- Deeters G., Die kaukasischen Sprachen, в кн.: Armenisch und kaukasische Sprachen, Leiden — Köln, 1963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Abt. 1, Bd. 7).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卡特维尔诸语言 (Картвельские языки)

[原作者: Г. А. 克利莫夫 (Г. А. Климов); 译者: 袁俭伟, 南京大学]

又称南高加索诸语言、伊比利亚诸语言, 高加索 (伊比利亚—高加索) 诸语言的南部语族。主要分布于格鲁吉亚, 以及阿塞拜疆、土耳其和伊朗的部分地区。使用人口约 380 万。包括 4 种语言: 格鲁吉亚语、梅格列尔语、拉兹语 (恰内语) 和斯万语。梅格列尔语和拉兹语构成赞语次语族, 它们往往被视为统一的赞语。然而, 与这种合并相抵牾的是, 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无法互相理解对方的语言, 缺乏统一的民族意识和共用的标准语。梅格列尔语、拉兹语、格鲁吉亚语拥有大量相同的新词语, 与以一系列古旧词为特点的斯万语不同。

从结构—类型学层面看, 卡特维尔诸语言系统相对统一。语音系统包括 5—7 个元音和 28—30 个辅音。塞音、塞擦音分别与浊辅音、送气清辅音和喉塞音构成三重对立, 擦音构成两重对立 (浊擦音和清擦音)。辅音成分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咽辅音列和喉辅音列上。组合序列同音位变体的差异不明显。元音系统方面, 斯万语的有些方言比较独特, 利用元音音长、元音变音的特点可区分出 12 个元音。卡特维尔语的词根音位结构以 CVC 型为主。辅音音位组和谐现象很有特色, 正序音位组 (bd, dg, tk, zg, tk) 中第一个辅音音位为前舌音, 第二个为后舌音, 逆序音位组 (db, gd, gz, xp, kt) 音位序位相反。重音表达不明显, 属力重音 (分析有难度可能与声调成分相关); 双音节词的重音落在第二音节, 三音节词落在第三音节。卡特维尔诸语言的形态复杂, 原因是不仅有发达的名词和动词词形变化聚合体, 而且有丰富的非常规变化。总体而言, 处于黏着型语言框架之中, 但综合性的程度高, 动词结构尤其如此。元音交替的古老系统及其晚近时期的积淀更为动词所特有。名词有数 (单数、复数) 和格 (6—9 个格的对立) 的范畴。变格聚合体包括主格、“叙述”格、与格、属格、工具格、状语格 (含数量不等的一些处所格)。变格系统通常是单一类型的 (只斯万语略有不同)。后置词系统丰富。第一、二人称代词不变化。形容词定语的词形变化有限。动词词汇最重要的组成原则是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对立。动词的基本形态范畴有: 人称 (表示主体、客体有两种人称变位形式)、关系、数、时和式 (用后缀表示)。卡特维尔诸语言有 11—15 种情态—时间形式, 它们按照动词词干的语义, 围绕现在时、一般过去时和结果时三种时间系列分类。词组成分之间有支配、协调、依附和一致等形式联系方式。区分出三种基本句子结构类型: 主格结构、“作格结构” (无论使用及物动词, 还是使用大量的不及物动词) 和与格结构 (使用感知动词时)。卡特维尔诸语言历史上清晰呈现出句子结构的主格化过程 (参见主格结构)。句中词序相当自由。谓语趋向置于句末, 直接补语依从动词后, 定语趋向置于被限定成分之前。句子的并列关系和主从关系都很发达。构词法 (前缀法、后缀法, 尤其是前缀—后缀法) 以及复合构词法也都很发达。借词中, 除了现代国际词之外, 还有为数不少的阿拉伯语词、突厥语词 (尤其是在拉兹语中)、波斯语词。令人感兴趣的还有源自一些西亚古代语言的借词。

以卡特维尔诸语言为母语者, 许多世纪以来一直使用格鲁吉亚标准语, 其最古老的文献

可追溯至 5 世纪。19 世纪后半叶，卡特维尔诸语言的研究开始将本地的传统和欧洲传统综合在一起。科学的卡特维尔学的形成与 М. И. 布罗塞、А. А. 察加列利、Н. Я. 马尔的名字是分不开的。G. 德特斯，А. Г. 沙尼泽、Г. С. 阿赫夫列季阿尼、А. С. 奇科巴瓦和 В. Т. 托普里亚的著述推动了卡特维尔学的进一步发展。现今，卡特维尔诸语言研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苏联的格鲁吉亚语言学家（参见高加索学）。

Чикобава А. С., Древнейш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именных основ в картвельских языках, Тб., 1942 (на груз. яз.) .

Гамкрелидзе Т. В., Сибилянтные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и нек-рые вопросы древнейшей структуры картвельских языков, Тб., 1965 (на груз. и рус. яз.) .

Мачаваринани Г. И., Общекартвельская консонантная система, Тб., 1965 (на груз. яз.) .

Топуриа В. Т., Труды, т. 3. Тб., 1979 (на груз. яз.) .

Deeters G., Das Khartwelische Verbum, Lpz., 1930.

Чикобава А. С., Чанско-мегрельско-груз. сравнит. словарь, Тб., 1938 (на груз.) .

Климов Г. А., Этимологич. словарь картвельских языков, М., 1964.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

格鲁吉亚语 (Грузинский язык)

[原作者: И. И. 卡夫塔拉泽 (И. И. Кавтарадзе); 译者: 袁俭伟, 南京大学]

卡特维尔诸语言之一[亦可参见高加索 (伊比利亚—高加索) 诸语言], 分布于格鲁吉亚, 以及阿塞拜疆、俄罗斯高加索北部、伊朗和土耳其的部分地区。格鲁吉亚的使用人口超过 493 万。有两个区别不大的方言组: 山地方言组 (赫夫苏尔、普沙夫、土施等方言) 和平地方言组 (卡尔特利、卡赫金、伊麦列金、拉钦、古里和阿扎尔等方言)。

格鲁吉亚标准语的发展划分为古代 (5—11 世纪) 和新时代 (自 12 世纪起) 两个时期, 或者古代 (5—11 世纪)、中古代 (12—18 世纪) 和新时代 (自 19 世纪起) 三个时期。新格鲁吉亚语基本形成于 18 世纪前, 与古格鲁吉亚语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词汇上。其语音系统由 33 个音位构成: 5 个单元音音位和 28 个辅音音位。塞音、塞擦音分别由 3 个辅音列 (浊辅音列、送气音列、挤喉音列) 构成。擦音由对偶音列 (浊辅音列、清辅音列) 构成。辅音的和谐组合 (tk, dg, px, cq 等) 很有特点。重音不显著, 没有音位功能。语言主要属黏着结构。只有一种变格法, 共 6 个格, 特点是无宾格, 有作格 (“叙述格”) 和转换格 (指向格、疏状格)。后置词与格形式结合成一体, 个别后置词的构造与独立的格单位类似。作格、主格与后置词不搭配。

有两个数: 单数和复数。名词没有性的语法范畴。语义范畴有表人与表物的区分。名词 (专有名词和代词除外) 用于呼语时带上标记性词尾。指示代词和指示副词都有三个系统 (取决于对第一、二、三人称的远近程度)。动词具有多重人称性质 (除单人称动词外, 还有双人称、三人称动词), 多用前缀法构成; 动词有人称、数、关系 (客体、主体或者多个客体间的领属关系或指向关系)、强制 (使役)、态 (主动态、被动态、中动态; 被动态还可表示潜在意义, 也就是行为的可能性、可企及性和非自主性, 即行为不得已等意义)、时、式 (构成 12 种变位单位) 等范畴。借助动词前缀表达体和方向 (往那里、这里、上、深处、内、外、下等)。动词区分为直接结构动词和倒装结构动词 (主体的人称用客体标记)、静态动词和动态动词、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没有动词不定式, 往往用也含有若干动词特征 [体、方向、强制以及态 (很少情况下)] 的动名词取代。有两种比较级别: 比较—最高级和指小级 (弱化级)。

构词法以词缀法和复合法为特点, 构词模式多样。计数系统采用二十进制制。句法的特点是, 主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与谓语语法形式一致; 非动物名词主语往往不与谓语发生一致联系。及物动词和某些不及物动词作谓语时, 主语根据时间形式可选用主格、作格或与格。复数形式的定语不与被限定成分保持一致联系。词汇系统, 除固有词外, 还包扩源自希

腊语、闪米特诸语言、伊朗诸语言等的借词。科技术语非常发达。

古格鲁吉亚标准语的基础是卡尔特利话（库拉河流域）。最古老的文字遗存是巴勒斯坦犹太沙漠（约 433 年）和博尔尼西的西翁教堂（493—494 年）出土的碑铭。И. 恰夫恰瓦泽 18 世纪下半叶领导了反对天主教牧首安东尼一世人为推广的三种语体规范（崇高体、中态体、低俗体）的斗争，这对于新格鲁吉亚标准语的发展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以卡尔特利和卡赫金方言为基础的统一标准语得以发展。И. 恰夫恰瓦泽、А. 采列捷利、Я. С. 戈盖巴什维利、瓦扎·普沙韦拉等人的作品就是用该标准语撰写的。格鲁吉亚语拥有十分古老的独具特色文字。（参见**格鲁吉亚文字**）

Руденко Б. Т., Грамматика грузин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Л., 1940.

Чикобава А. С., Грузинский язык, в кн.: Язык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т. 4, М., 1967 (лит.).
на грузинском языке:

Квачадзе Л., Грузинский язык, ч. 1, Тб., 1969.

Его же, Синтаксис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грузин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б., 1977.

Дзидзигури Ш., Разыскания по грузинской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и, Тб., 1970.

Шанидзе А., Основы грамматики грузин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б., 1973.

Его же, Грамматика древнегрузин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б., 1976.

Почхуа Б.,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грузин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б., 1974.

Топуриа В., Труды, т. 3, Тб., 1979.

Deeters G., Das kharthwelische Verbum, Lpz., 1930.

Tschenkéli K., Einführung in die georgische Sprache, Zürich, 1958.

Vogt H., Grammaire de la langue géorgienne, Oslo, 1971.

Shimomiya T., Zur Typologie des Georgischen, [Tokyo], 1978.

Harris A. C., Georgian syntax. A study in relational grammar, Camb. — [e. a.], 1981.

Чубинов Д., Грузин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Пб, 1887, 2 изд., Тб., 1984.

Орбелиани С., Грузин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б., 1928.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грузинского языка, т. 1—8, Тб., 1950—1964.

Чубинашвили Н., Грузин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 русским переводом, Тб., 1961.

Абуладзе И., Словарь древнегрузин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б., 1973.

Русско-грузин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б., 1981.

Georgisch-Deutsches Wörterbuch von Kita Tschenkéli, fasc. 1—26, Zurich. 1960—1974.

（许高渝、张家骅 审校）